

联合国
大会
第四十八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九次全体会议
1993年9月29日,星期三
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英萨纳利先生
(圭亚那)

嗣后: 皮尔苏先生(副主席)
(格林纳达)

嗣后: 尼亚基先生(副主席)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嗣后: 韩先生(副主席)
(大韩民国)

下午3时40分开会

议程项目127(续)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宪章第19条)(A/49/414/Add.
3)

主席(以英语发言): 在审议本次会议的议程项目之前,我要提请大会注意文件A/48/414/Add.3。秘书长在该文件所载的一封信中通知我:自从他1993年9月21

日、24日和27日的信函印发之后,马里已支付了必要的款项,使其欠款降低到《宪章》第19条所规定的数额。

我是否可认为大会适当注意到这一情况?

就这样决定。

玻利维亚共和国宪制总统贡萨洛·桑切斯·德洛萨达先生的讲话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 大会首先听取玻利维亚共和国宪制总统的讲话。

玻利维亚共和国宪制总统贡萨洛·桑切斯·德洛萨达先生在陪同下走进大会堂。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荣幸地代表大会欢迎玻利维亚共和国宪制总统贡萨洛·桑切斯·德洛萨达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桑切斯·德洛萨达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要向大会主席、圭亚那的塞缪尔·英萨纳利大使,向前任主席、保加利亚的斯托扬·加内夫,以及向秘书长希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表示问候。我祝贺他们积极致力于和平、正义、人类发展与国际法的原则。

我还要向聚集在这一历史性大会堂的各会员国国家元首和代表们致意。

玻利维亚尽管具有人类历史上排名第7的最高恶性通货膨胀率,然而却一直是在于1985年随着民主和自由的到来而开始的结构改革的先驱者——这种改革是在作出最大牺牲和没有限制人权的情况下进行的。我愿借此

本记录可以更正。

对本记录的更正,应经有关代表团的一位成员签署后,在本文件印发日期后的一星期内送交
逐字记录科科长(C-178室),并编入记录的副本中。

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Distr. GENERAL

A/48/PV.9
15 October 1993

CHINESE

机会向我国当时的总统埃斯登索罗博士表示谢意,并代表全体玻利维亚人向他的具有政治家风度的领导才干致以特别的敬意。

事后看来,这似乎并非是一次如此伟大的任务:在自由的条件下。控制经济危机并实现和平变革,是拉丁美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很多国家正在完成的活动。例如,俄罗斯局势提醒我们注意在管理一个危机中的社会——一个需要变革的社会——所面临的取得协商一致意见与合法性的困难。

玻利维亚的进程需要胆略与想象力。我们在呼吁我们的人民作出牺牲并承担额外的负担方面并未退缩。然而我们深感震惊的是,我们看到如此多的国家走上民主与变革的道路,争取实现稳定的增长和发展以及社会正义,然而我们却注意到发达世界并未作出任何相应的努力。

冷战的结束点燃了希望的灯塔,然而我们感到吃惊的是它并未带来国际合作与团结的加强。在对抗时代存在着更大的合作,因为要使第三世界国家免受共产主义的威胁并以建立在团结和发展基础上的关系取代冷战。而今天正相反,贫穷国家面临着对其援助的削减,我们原料的价格继续下跌,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世界上锡、钨、锑、咖啡、橡胶和石油的目前实际价格甚至比大萧条时期的1930年还要低。

在这种凄凉背景下,很难看出我们将如何解决我们的问题:人口从乡村到城市地区以及从城市到发达世界的迁徙,贩毒的增加以及贫穷人民实际上被迫破坏自然以求生存的现象。这造成一种恶性循环,更为加深了贫穷。

我们时代的一种怪现象是,在总体来讲愈来愈富有的世界中,贫穷却在增长。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更大。我们所有人必须对付国内社会和经济缺陷所产生

的不稳定。我们正视国际大家庭和人类社会的团结和发展问题的方式也迫切需要根本改变。

发达国家或迟或早总会认识到目前形势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却会伤害每一个人。我真正认为,我们必须对以下问题有清楚的认识:人口增长、人口加倍、对环境的破坏、生产和贩卖非法毒品、从穷国移民到富国,这些问题不仅只影响那些国家,而且会影响整个世界。

解决办法是进行更大的发展。我们知道,当人民的收入增加,当妇女受到教育以及当有了社会正义之时,人口增长率也会发生变化。

我们知道,为了恢复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平衡,我们需要受过教育的人,他们会利用关于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专门遗产和知识——正如我国的情况那样。

正如我们过去必须懂得当我们伤害大自然时它能惩罚我们一样,我们所有国家,发达和不发达国家认识到这样一个现象是不能被接受的时候到了,即世界上富国变得更富而穷国变得更穷。

如我们所知,解决并非仅仅是提供金钱或援助,但是如果我们不改变旧的观念就没有其他办法实现我们的目标。座右铭应该是“贸易而不是援助”。然而看来似乎不发达世界的命运是“没有贸易也没有援助”,这对我们大家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如果我们想建立一个新的、更公正及和平的社会的话。

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人的方面和社会及经济方面,解决办法将会变得更为昂贵和更为困难。我认为,我们所需要的是那些引导世界命运的国家具有更大的远见。它们必须找到真正有效的解决办法。

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重复历史。但是在过去有诸如马歇尔计划之类的计划,这些计划既帮助捐助国也帮助受援国。我们需要类似的办法。我们怀着巨大的

期望期待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我们祝贺克林顿总统致力于反对这个国家和北美其他地方的保护主义势力以低努力向前进。

作为一个小的发展中国家。玻利维亚满怀希望看待这一切,并将这视为一种承诺,即我们将能够向发展中国家出售我们的产品而不仅仅是向他们送人。

我们期待乌拉圭回合迅速取得圆满成功,因为我们认为生产机会的自由是我们各国社会的唯一希望。世界上的儿童仅仅要求他们的父母能够工作并把他们的每日食粮带回家来。但是这种事情只有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世界——团结在一起并给予每一个人同等机会和机遇时才会发生。

我们不要求特殊待遇,我们不只是要求帮助。我们要求允许我们工作和出口,而不只是被迫向发达世界出口我们各国社会最有才干和精力充沛的人民。

在玻利维亚,我们正在努力前进,进行利用外国资金的项目,并由我国人民参加。我们的人民十分贫困。我国知道自己需要技术和资金,在未来的岁月中我们希望能进行一项雄心勃勃然而可行的计划。

这一计划有三大支柱:投资、民主和人民参与。

首先,我们希望引进外国资本来发展技术和使用新的资源以便丰富我们的国营企业的遗产。我们不想出售我们的遗产,我们也不要只有国家参与。

第二,这些企业的50%和股票的50%必须由全体玻利维亚人所拥有,以使这些玻利维亚人能够参与这些企业,并感到包括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之中。

第三,许多人问,“我们怎么能把免费商品送给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不知如何读写、有着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人?”事实是,在玻利维亚许多人不认字但是他们知道如何计数。他们知道参与意味着什么。他们知道感觉到他们参加了国家的命运意味着什么。在他们

参与下,我们希望向贫穷的街坊和社区提供那里的人们所需要的医疗和教育,使他们能分享管理。

下一个千年将不再会认为代议制民主政体够了。必须是分享民主制。人民要参与,当涉及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和未来的事宜时,他们将参与得很好。

我们认为,我们各国社会不足的资源将产生更大的生产力。需求将会增长,它将使我们各国社会能够向前发展。

但是在玻利维亚,参与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五百年来的第一次,一位来自土著民族的人成为我国的代总统。对玻利维亚人民来说,维克托·乌戈·卡德纳斯不仅是一个阿玛拉印第安人,一个乡下人,而且是一位出色的专业人员,一位杰出的知识分子。他体现了我们的愿望,即所有公民都应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作用。我们希望消除长期以来的不公正。我们希望促成变革,让民众参与进来,而不是将他们排斥在外。我们希望推动团结,同时尊重不同意见,不仅是在生态和环境问题上,而且是在文化、地理和种族问题上的不同意见。

我们相信,这一让民众参与而不是排斥民众的决心,将有助于建立一个有秩序地变革和变革带来秩序的社会。虽然我们是拉丁美洲乃至全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但我们相信,我们体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有可能生活在社会安定之中,并在民主社会总框架下恢复稳定、增长和社会公正。在玻利维亚,民主是行之有效的,因为人民寻求协商一致,他们寻求尊重,他们接受差异。

这一进程将使我们形成一种良好的局势,有助于解决就业、教育和保健,最重要的是农村部门的问题,在农村,贫困程度最为严重,那里的人也是世界上最贫困者。

活跃的增长当然会减少种植古柯叶的需要。在玻利维亚,我们成功地将种植古柯叶的土地面积减少了50%。我们是在没有伴随毒品贸易而来的游击暴力,在这个国家也不存在卡特尔的情况下取得这一成绩的。虽然我们无疑在这一领域取得了进展,但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取代古柯叶种植的唯一发展活动是立足出口的轻工业。正如我早些时候所说的,当咖啡价格下跌一半,或没人需要可可或橡胶时,告诉玻利维亚农民去种植咖啡、可可或橡胶是没有用的。替代性作物的经验强调了下述事实,即必须使象玻利维亚这样的国家、尤其是玻利维亚能够以制成品的形式向发达国家出口其产品,而不是向人类的其他部分输出毒品。然而,我们将继续与贩毒活动作斗争,因为我们不仅向我们的人民,而且向整个人类作出了承诺。虽然我们很贫穷,但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为减少需求正在作出新的努力。我们所希望的是减少供应。我们希望消除这一贸易,及其有关的社会、道义、法律和体制的危险。实际上,我们选择了零点方案。我们期待胜利,不管能否得到帮助。但如果我们能够得到世界其他部分的支持、合作与谅解,我们更有可能取得胜利,毕竟,世界的其他部分也受到这一可怕灾祸的影响。

我们的事业确实是一项雄心勃勃的事业,但它是可行的。我们承认,玻利维亚人应对这一计划负主要责任。我们并没有坐等其他人来帮助我们。实际上,我们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很清楚饥饿不能等待,人们只能自己去寻找解决办法。但我极其真诚地认为,如果没有国际合作,就很难解决这些问题。应当有一些外来的迹象表明,随着贸易壁垒的加强,援助不会就此终止。

玻利维亚对环境问题作出了艰巨的承诺。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的贫困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忽略。我们越来越多地用贫困,来为我们在日常

活动中毁灭自然资源辩护。我们确实有一项伟大的计划,一个具有国际意义的计划,不仅仅是解决我们的国际收支问题,不仅仅是创建工业中心以形成我们需要的能源基础,而是要努力减少环境污染。这一计划要求同巴西一道,建立一条管线,将玻利维亚的天然气输往圣巴勃罗市场。随着工业和汽车使用廉价、非污染的能源,我们可以推动从根本上减轻拉丁美洲的污染,促进玻利维亚、巴西和整个世界的福祉和发展。

人权必须成为新的国际社会的象征,我们必须实现在社会公正基础上的发展权。我们并不是在乞求一件礼物。我们要求的是机会。联合国正发生变化。它需要变化,因为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冷战时期的严峻对抗之后,我们必须应付冷战造成的所有危害,尤其是在第三世界造成的危害。我们必须为全球的团结重新定向。不仅仅是在援助问题上,我们必须接受一个实际上非常简单和合理的概念。一些国家在做生意时,在同其他富国进行贸易时富了起来。相信一个人富是因为其他人贫穷是过去遗留下来的观念。我们时代的一个巨大教训是,集聚财富的唯一途径是帮助人民摆脱贫困的枷锁。

我们欢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的协定。它标志着新的和平时代的开始,标志着新的全球正义精神和面对历史情况国家之间对话精神的开始。共同承认不能接受通过战争来夺取领土,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这也是一个伟大和历史的教训;即使在一个领土争端旷日持久的地区,文明对话、常识和人性也能够取得成果,并能够使各民族走到一起,而不是彼此隔绝。

最近,在拉丁美洲心脏地区,我们统一了两个国家: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它们在61年前因战争而分裂,现在决定共创未来。这对我们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因为

自握手言和以来,自两国间达成协议以来,我国查考战争的老兵们曾打着巴拉圭的大旗游行。要是那些打过仗的人,那些牺牲了同志的人都愿意忘记过去,我们又怎么能不忘呢?

这些令人振奋的事说明了怎样才能解决最严重的冲突,使我们真诚地希望同样的精神能指导我们某求最后解决玻利维亚为时114年之久的陆锁问题。许多人说:“你怎么能索取114年前失去的东西?”我的回答是:我们有极大的耐心;我们的人民等待了500年才得回他们的土地,赢回他们的国家以及参与社会的权利。我相信,非正义不是我们注定的处境;我们将继续通过理性而决不是武力,提出我们的要求。我们将继续索取海洋通道的权利,直到得到它,直到大海干涸。

一旦得到,就不再有问题,而我们也不会提出进一步的要求。然而我们要是在政府一级,在领导阶层上继续讨论两国已经愿意某求解决的问题,那我认为继续阻碍两个兄弟人民都要求的历史性联合将是一种真正的污辱。解决办法有可能达成;奇迹确实会发生,但我们已经看到奇迹是工作与发挥想象的结果,而在这方面我们保证,不带侵略性地,冷静与镇静地做我们所能作的一切事,用我们所有的创造性某求解决办法,战胜我们生存的这个新世界的挑战,并满足它的愿望,实现我们所要求的变革。

在这个变革时代,我们必须依照我们自己的创造力。我们了解自己努力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希望这个世界上其他人同我们站在一起,至少让我们有机会表明我们能做些什么。

我们必须沿着历史要求的新的道路安全地前进,而我们要求并以一贯的和更新了的热情力图确保这条选定的道路是团结、幸福和各国以及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道路。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代表大会感谢玻利维亚共和国宪制总统刚才的讲话。

玻利维亚宪制总统贡萨洛·桑切斯·德洛萨达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加拿大总理金·坎贝尔夫人的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将听取加拿大总理的讲话。

加拿大总理金·坎贝尔夫人在陪同下走上讲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非常高兴地欢迎加拿大总理金·坎贝尔阁下并邀请她对大会讲话。

坎贝尔夫人(加拿大):自上次召开大会以来的一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我们看到在几十年来困扰着国际社会的两个地区取得了突破——南非和中东。要成功地解决这两个问题是困难的,但我们有充分理由感到乐观。加拿大为有关各方的勇气和远见欢呼,并保证它将继续尽其所能促进进一步的进展。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悲剧——在索马里、波斯尼亚、安哥拉和其他地方,那里至今无视我们实现和平的最大努力。

正是在这种既有更新的希望又有破灭的希望的情况下,我愿意谈谈联合国的中心任务:保卫和促进和平与安全,实现它们的条件。这也是加拿大的使命。

自从莱斯特·皮尔逊于1956年发明了联合国维持和平以来,我们就一直参与;同越来越多的成员国一道在现场执行它,承担了牺牲,为和平作出了艰苦的努力。自1956年以来,加拿大为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的行动派出了将近10万男女。这一贡献对我们来讲是代价昂贵的,牺牲了相当的生命。尽管如此,这种贡献对多

教加拿大人来说是自豪的象征,是我们民族要求更好的世界的具体表现。

加拿大人以产生于承诺的经验论事。我们看到必须进行变革以及必须保持不变的原则。世界正苦于寻求冲突和战争的多边解决方案。这是我们的时代,联合国的时刻。我们正经历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治转变。冷战的确定性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不可预见性和不稳定——一种对我们前途的政治上的不安,以及对集体努力会将我们带到何处不明朗。多数国家在军事上感到更安全,而我们的公民在其生活中对其幸福、他们自己以及未来时代却感到不那么安全和确定。

但这一更广泛的视觉不应模糊我们对非常现实的军事危险的存在看法:常规武器的过分积累;大规模破坏性武器——化学、生物与核武器——的扩散;以及由于公民和政治社会在国家内部和跨越脆弱并通常是新的边界的崩溃所产生的冲突和人类苦难。

世界在最近几年汲取了一些深刻的教训。首先,我们懂得了我们的安全是彼此依赖的。每一个引起关注的具体区域内——无论是军事、经济、环境或健康——任何国家都不能孤立存在。我们所有人都受到超越我们边境的各项发展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并且我们在各自国家内所采取的行动都不可避免的在更广泛地国际社会引起反响。

其次,我们懂得了我们的安全是不可分开的。我们无法逃脱问题之间存在的各种联系;比如说,经济增长、环境安全与人口流动之间的联系。任何一个方面的恶化会导致全局的不稳定。我们必须更广泛的,从解决不安全的基本根源的角度思考安全问题;比如经济发展与繁荣问题;环境一体化;免于受到犯罪和人体危害;健康;加入反映我们价值观、传统和理想的社区的问题。

第三,我们懂得了真正的安全并不是管制和压制。它是在国家内部和跨越边境的不同利益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

第四,我们懂得了我们必须寻求解决安全问题的更具有合作性的方式,即那种最大限度地利用许多现存机制的相对优势的方式。我们预见到一种协作性安排的网络——地方的、区域的和全球的——构成一个新的集体安全体系的各组成部分,而所有这些部分都以联合国为焦点。

《联合国宪章》本身提供了有用的指南,它描述了联合国与各区域性机构在和平解决地区争端方面可能具有的关系。联合国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共同体在欧洲的合作;联合国与英联邦和非洲统一组织在非洲的合作;以及联合国与美洲国家组织在中美洲和海地的合作使我们沿着《宪章》的起草人所预见的道路上取得了长足进展。此外,各区域性组织通常在处理不稳定和潜在冲突的地方根源方面具备最佳条件,比如水资源争端、人口转移或人权方面的问题。

几十年来,冷战束缚了我们。那个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履行《宪章》的承诺并建立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合作安全体系的能力牢牢在握。因为只有联合国才能为阐述新的原则和商讨新规则与标准提供一个全球性讲坛。也只有作为世界性机构的联合国才能对具体的关键性问题给予国际社会的全力关注。

仅在过去五年中,联合国所参与的各种多边军事努力有了剧增。五年前此类行动只有七个。今天则有十六个。五年前联合国部署的军事人员有9 000名,今天则有将近80 000名,超过了加拿大所有正规军事力量的总和。今天,在我们环顾世界局势时,数目更多的行动的可能性不能不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

联合国行动最近发生的转变不仅是数量方面的。事实是,联合国目前从事于一系列远远超出我们过去所习惯的传统的维持和平概念的范围。秘书长的具有开创意义的《和平纲领》的大部分内容已经从规定阶段走向现实,这是正确的。人们询问联合国是否并在何种条件下应将其资源致力于解决国际危机是十分恰当的。同样恰当的是询问联合国是否具备完成要求其成的任务所需的正确工具。

(以法语发言)

过去几年联合国行动的迅速扩展既是前所未有,也富有教育意义。我们在此过程中都汲取了一些教训,有的是以十分痛苦的方式。对我们最近的经历进行反思并决定我们如何一道改善我们更加有效的行动的能力是明智的。

加拿大作为几乎每一项联合国军事行动的积极参与者已作出其自己的判断并针对某些问题采取的一致方法得出了其自己的结论。

(以英语发言)

首先,我们必须改善我们进行判断的集体能力,以便准确和冷静地确定即将到来的威胁的性质以及逐个案例的事实真相。我们还必须提高我们的行动能力,以便在世界恶化为危机之前作出坚定有效的反应。

我们目前能够在预防性外交领域采取一些步骤,以改善我们的集体能力。最近提出的关于加强我们预报系统的倡议应得到实施。为从事这项工作,秘书长应得到进行独立政治分析所必要的资源,以便武装冲突爆发之前并且在非军事性干预仍然有效的情况下他能够利用这种分析。警报不仅仅要及时,它还必须对决策产生影响。秘书长必须充分利用《宪章》第99条的各项条款,将可能危及和平的局势提请安全理事会的注意。这本身会对全球注意力和必要采取的预防性行动给予有

力的推动。

联合国在秘书长斡旋下从事预防性外交的能力必须得到加强。秘书长为解决众多的冲突和潜在冲突的努力需要得到切实的支持。预防性部署维持和平人员以防止冲突的爆发会是十分有用的,并且从长远看能够避免稀有资源更大的投入;就象我们最近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所作的那样。

我们认为联合国军事力量在全球的派出经验表明一些不足之处。我们所有人有义务通过改变办事方法对这些不足作出迅速反应。首先,重大行动不能继续在特设基础上完成。联合国的管理、计划和运转能力必须得到加强。必须建立一个有能力控制两个或更多的大规模、各方面行动的永久性战略指挥班子。考虑到有效性,该指挥部需要具备完整的信息处理与策划能力。

其次,联合国将人力物力迅速运往行动区域并确保设备与人力资源之间的协调能力必须得到加强。过去秘书长常常不得不因为人员或物资的不足推迟经联合国核准采取的行动。

象正在出现的热点迅速部署联合国部队的的能力必须大幅度的提高。联合国各成员国至少应向秘书长作出提供符合就绪标准的后备部队的正式承诺,就象加拿大在过去的一年中所作的那样。

第三,联合国会员国必须建立和发展未来联合国使命所必须的规模强大的维持和平核心队伍。维持和平任务需要文化敏感性,斡旋的能力及许多其他技能。将需要对那些在复杂、困难和危险情况下发挥领导作用的人提供培训,特别是一批高级官员。培训是成功地将各不同国家派出人员统一为一个整体行动的关键。

第四,我们需要保证实地行动达到高水平操作标

准。为所有在联合国旗帜下服务人员制定一项共同行为准则和操作系统的工作应尽早结束。

第五,我们还必须着手解决维持和平人员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危险。我们和其他国家正在就保护联合国人员,尤其是那些从事和平活动的人员的各项原则和措施作出澄清和整理工作。加拿大将为这样一项公约在以后大会期间得到讨论提出具体条款。

在过去的几年中,提出了一系列革新的提议,以便加强联合国采取有效的多边军事行动的能力。加拿大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就其中许多建议进行了广泛的辩论。事实上,有一些建议是我们提出的。当然,我们充分意识到,我们的建议只是一种观点。要实际实现这些建议,就必须得到联合国会员国的广泛得多的支持。

因此,为了最有利于联合国将来的努力,现在应该设立一个具有联合国行动方面的经验的文职和军事专家小组,负责评价这些提议和其他可以进一步加强联合国行动能力的提议。应该在明年夏天最后拟妥这份报告并将其提交秘书长。该报告应该包括关于提议的价值,以及同样重要的,如何能够对它们以执行和支助的明确建议。该报告转过来又将向我们提供一个基础,以便就是否着手采纳其中任何建议达成集体的决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不仅更为明确地确定潜在的需要,而且更为明确地确定这些提议所必需的支助。

这样一项审查工作的议程将包括:设立一个常设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学院,以便培训军官;为联合国部队设立更多的培训设施;逐步建立一个联合国物资供应站网络,以便储备用于迅速部署新的联合国行动的装备;联合国会员国是否将按照名义成本——如果按照任何成本的话——提供设备和材料,以便可以由在其自己的军事设施上没有这类资源的联合国特遣部队使用的问题;以及可能在一个新的联合国自愿部队的基础上创建一支联

合指挥下的常设迅速部署部队。

很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应该列入该议程。然而,关键是进行上述评价。我国政府作出承诺,在重新评价我们自己的军事能力,包括我们对联合国行动的参与的方面对这些问题和其他有关问题进行审查。

安全不仅仅是一个能够及时部署数目充分的部队的问题。现代的联合国特派团所利用的专门知识远远超出传统的军事维持和平的专门知识。为了重建基础结构,需要有民警、选举工作人员、人权监督人员、工程师、行政人员和其他专家。仅仅制止敌对行动是不够的,人们现在还期望联合国建立和平。

我们正从一个在敌对力量之间安插维持和平人员的传统转变到新形式的任务。重建社会,使其能够自力将是一个复杂和漫长的过程。通过外交实现和平、使用军事和文职人员维持和平和建立和平构成了新的挑战。我们认为,已经很明显,如果我们要成功地处理许多需要联合国使用军事力量的危机,联合国现在就必须要有一个更为综合和协调的方式。在这方面,我们已在柬埔寨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在其他局势中,例如索马里,我们所取得的还远远不够。联合国军事行动本身并不能处理或解决冲突的根源。只有通过基础广泛得多的努力,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努力,才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实际上,我们需要一种在一定时间内重建遭受结构性崩溃的国家或社会的能力。

在恢复了活力的联合国的领导下建立一个有效的合作安全体系需要资金;然而,真正的安全总是带有值得付出的代价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必须全都分担负担。这意味着全部和准时地支付联合国的帐单。加拿大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期望其他国家也这样做。不付款和积累拖欠款给联合国系统和我们采取有效行动

的集体能力所带来的破坏无论怎样强调也难过分。

分担负担意味着参加联合国的活动,既包括为维持和平任务提供部队,也包括为监督选举提供观察员。今天,在所有联合国部队中,加拿大提供的部队几乎达4%。不到一年前,加拿大的部队占有所有联合国部队的10%。当我考虑到加拿大在世界人口中占不到0.5%,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全球军事开支中占不到1%,这些数字就变得非常引人注目。这并不是说我们正寻求发挥较小的作用,使其更为符合我们在世界上的相对地位。相反,这是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其他国家是否在公平地分担其责任。

分担负担还意味着分担制定和作出决定,并保证决定和承诺得到遵守的政治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越来越注意起草明确的任务,清晰地制定目标并规定最后期限。如果联合国要保持其信誉和效力的话,明确和现实的任务是必要的。

在加拿大,正如在一些其他国家中一样,政府正面临着困难的财政情况,面临着这个要求政府提供更有效力和效率以及更经济的服务的公众。在过去几个月中,我们本国政府一直在着手处理使政府合理化、精简机构以及结束重叠、重复和浪费现象的需要。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将继续下去。对于我们本国的纳税人,我们有责任保证把同样的标准和目标适用于我们作为其成员的各国际机构。

联合国各机构不能继续与二十世纪末的财政和政治危机相隔绝。它们也必须变得更精简、更有效、更有放权、更负责和更快地作出反应来帮助分担负担。它们必须向各会员国正在做的那样,适应新的技术、持续地财政紧张状况以及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好的工作的挑战。这里的体制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应有任何职位、开支或机构免于我们在加拿大,以及别

的人在其他国家使我们本国的体制所接受的仔细审查。

我们欢呼秘书长所发起的改革并保证我们支持进一步的行动。我们促请他加紧工作,并促请所有会员国支持他的努力。这关系到我们的安全以及世代代的安全。

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如果我们不能集体地着手处理一个必须被视为当前对国际安全最危险的威胁的问题,即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普遍扩散,那么,我们为改革联合国建立和平和维持和平职责所进行的全部努力都将徒劳无功。在世界上许许多多地方,涉及核武器的冲突前景带来破坏已经紧张的局势稳定的危险,并可能导致其程度无法想象的人类灾难。我们必须下定集体的决心,以便给《不扩散条约》装上牙齿,严厉地惩罚那些违反其规定的人,并使那些遵守其保证的人获得信心。我们衷心地欢迎克林顿总统对这个问题给予的优先重视以及他所提议的实际措施。

我们自己的优先事项是明确的:在削减核武器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无限期延长和普遍遵守《不扩散条约》;就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举行谈判;在使化学武器公约生效方面早日取得进展;以及加强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在对和平与安全进行这些直接投资的同时,必须采取集体行动来解决不安全的根源。

我们必须发展和巩固民主制度和法制。现代历史教导我们,民主国家是最不可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是和平的最好捍卫者。在国内公平地实行法制是维持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的最可靠途径;在国际上,这是在争端变成危机之前就对其予以解决的最好途径。

我们必须保护和促进人权。安全从个人一级开始,当人们,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少数还是多数,无法捍卫其尊严并行使其固有权利的时候,就无法有和平或

安全。大会必须在今年早些时候举行的维也纳会议所取得的进展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并同意在今年年底以前设立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的职位。

我们必须努力解决那些往往成为不稳定和不安全现象的要害问题的贫困、贫穷和经济不发达现象。秘书长应当起草一份发展纲领。它应该包括大胆的重新考虑联合国可以如何最好地发挥它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内的重要作用,而同时避免重复进行那些可在其他地方得到最好实施的各项活动。纲领可有助于重新明确联合国在与其他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密切合作之下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在庆祝儿童问题最高级会议的三周年时,我们要同样地感谢全世界的儿童。

(以法语发言)

经济要持续发展,就必须尊重环境。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履行去年在里热最高级会议上我们对保护环境所作出的集体承诺。不采取这种行动而造成的社会和经济代价简直是无法接受的,这对有赖于大西洋渔业的数以千计的加拿大人来说,是一种再也逼真不过的现实了。

(以英语发言)

大西洋西北部以及其他地区渔业严酷的崩溃现象令人信服地证明有必要紧急解决这一危机。联合国必须紧急地通过一项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体制来保护和管理公海鱼群。

但是,任何数量的发展援助显然都比不上通过我们各会员国之间更自由的流通货物、服务、资金和思想所取得的经济增长。其实,我们在朝增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繁荣方面所共同迈出的一个最重要的步骤,将是刻不容缓的在多边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中取得一项实质性的成果。这些讨论已经达到了关键的阶段,我们绝不能失去这一宝贵的机会。我国政府依然保证

作出自己的贡献来达到这一目标并寻求诸如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实现贸易自由化的其他机会。我们深信该协定将使北美各国经济变得更具有竞争能力和更为开放并将为全球的贸易投资提供许多必须的促进因素。

我们的和平和安全并非垂手可得。我们必须在我们各自的国内、在我们各自的地区内、并在全世界范围内为之进行工作,努力地进行工作。我们必须更新和重振现有的结构,并在必要时重建这些结构。我们有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来遵守联合国宪章的语言并履行遭到违背的早期的诺言,以便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建立起一种和平与安全的合作系统,这种系统尊重分歧,但坚持人的尊严和自由的普遍原则。让我们现在就一起共同向前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大会感谢加拿大总理刚才所作的讲话。

加拿大总理金·坎贝尔夫人在陪同下离开讲台。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总理亚奈兹·德尔诺夫舍克先生的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总理的讲话。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总理亚奈兹·德尔诺夫舍克先生在陪同下走上讲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十分高兴地欢迎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总理亚奈兹·德尔诺夫舍克先生阁下,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德尔诺夫舍克先生(斯洛文尼亚)(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向你和圭亚那共和国表示祝贺,衷心祝贺你担任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主席。本届大会是在大家都一致认为世界历史上的一个特别时刻举行的,因此特别重要之点是它能取得尽可能的成功。你指导大会工

作这一事实鼓舞了我希望会是如此。

我还要利用这一机会对第四十七届会议主席保加利亚共和国前外交部长斯托扬·加内夫先生阁下的贡献表示感谢。

斯洛文尼亚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和联合国的会员国而存在,其本身就足以证明世界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这一事实。和一系列其他的国家一起,不管这些是新成立的国家或是已经摆脱了有限主权枷锁的国家,或是同时属于两种情况的国家,斯洛文尼亚当然不仅仅是这些变革的对象,而是积极参与这些变革的重要角色。推动这些变革的动力是各国人民的民主愿望,他们的民主运动以及来自社会生活各阶层的杰出个人。联合国宪章的许多基本原则,特别是尊重人权的原则,推动了他们为争取政治和经济变革的民主运动。

今天当我们注视着目前正在以前被称之为东方的那一部分世界中的进展情况时,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事实。那些我们认为是这些变革本身所产生的悲剧性的事件,不应该使我们对那些作为个人或作为根据历史、文化和语言所界定的实体的成员的男人们和妇女为争取自由和尊严而进行的运动记忆模糊。新的民主国家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他们正在加强民主体制和民主机制的效能。另一方面,在东方另一个较小的地区,存在着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仇恨所造成的疯狂的破坏性暴力行为。

已经改称为“前东方国家”这一概念的旧的术语妨碍了人们真正的理解它所指的那一部分世界中目前正在发生的事件。意识形态的概念应代之以尊重个别地区的文化和历史特点的术语,而在近来的历史中,所有为人所知的政治活动和意识形态企图消除这些特点。

在早些时候发展了民主运动的前社会主义各国目

前正经历着稳定的民主发展。在另一方面,在那些突然面临着两极世界结束而其民主运动只不过是刚刚开始是集权主义政权的国家中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真空状态导致出现民族主义,并随之出现扩张主义和严重违反人权和少数派权利的行为。前南斯拉夫是典型的多种族国家,是由六个以不同领土所界定的成员国组成的联邦。它经受了其前疆域内这些不同所造成的后果,因此就无法幸存下来。

每个区域都有其自己的特点。尊重这些特点会在多边合作基础上,大大促进稳定与和平发展的前景。虽然不管结果如何,变革进程确实在欧洲非常突出,但从更广泛意义看,这一点不仅适用欧洲。我所指的变革是对大多数国际合作原则和为促进国际合作而创建的大多数机制的严重考验。自决权利就是一个例子。一方面,一些国家被剥夺了这项权利,另一方面,滥用这项权利来进行侵略扩张和掠夺土地却得到容忍。

自冷战结束以来,联合国的作用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联合国面临着一些问题,必须以同这种新气候相符合的新办法处理这些问题。现在大家多少都清楚,我们在本组织内不能没有使它能够按时代要求作出反映的新概念和新机制。在各国内加强人权和民主并在其相互关系中同样体现这一原则至关重要。

人们都殷切期望联合国正视这些问题,并能够有效地进行调整。为了作到这一点,大会应该提出这方面的建议。让我提及大会建议可以包括的若干领域。

国际法的实质性规定及其经各方同意的执行机制需要进一步发展。虽然不干涉各国内政的原则应该受到各项充分的国际规定标准的合理限制,但这项原则应该得到重申。国际合作和各国相互依存正在不断缩小基本属于国内管辖问题的范围,而合法国际行动的范围却在扩大。在这方面,似乎存在着进一步保护人

权,少数民族权利和环境的机会。今年6月在维也纳召开的人权大会已声明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全球标准,并建议设立一个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斯洛文尼亚打算在本届会议期间就促进联合国在人权领域的活动、加强人权中心和设立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等问题提出建议。

经济合作特别重要。必须在同新成员合作的范畴内看待一系列现有国际组织架构内的合作和一体化。各贸易集团成员和非成员之间经济合作协定,虽然有时很慢,但已经开始缔结。总之,这些联合决不应排斥新生民主国家,因为这样做会从一开始就大大阻碍新生民主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都希望,各区域经济委员会,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各国际金融机构将发挥其影响,以帮助消除障碍。

去年在里约地球问题首脑会议上,我们曾参加为就环境问题进行更密切国际合作的各项努力。我们将全力支持联合国实现包括持久发展在内的里约会议的各项目标,同时找出这一领域的新闻题。当然,如果,没有足够的监督和制裁措施,我们就不能取得成功。

自冷战结束以来,欧洲安全有了不同的面目,新生国家进入了欧洲舞台。一些具有所谓防御目标的军事安排已经解散,一些国家为保障其安全正在谋求新的安排。这代表着一个不应失去的机会。欧洲应该能够通过各国均享民主,前瞻性和充分的安全安排填补安全真空。鉴于这是历史上首次不必靠增加防御支出实现安全,欧洲就更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十分令人鼓舞。另一方面,我们将面临不同区域爆发新冲突的危险。这种局面比任何其他问题都更加需要预防性外交,预防性外交就其真正性质而言,是联合国的协调问题,联合国的意见应该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形成。诸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欧安会)和西欧联盟等现有安全联盟应该得到系统的扩大,应该认真确

保他们同联合国各决策机构之间的协调。从这个观点看,今年5月联合国和欧安会之间签署的协定令人鼓舞。应该认真考虑在安全理事会坚定授权采取及时行动可以防止危机的任何地方建立快速行动部队。这样做可能非常有益。

两年来,斯洛文尼亚对其自己的军事潜力进行了大幅度 and 单方面的限制。前南斯拉夫军队在斯洛文尼亚领土上的军事设施一半以上已确定改为民用。但是,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仍然受到安全理事会对前南斯拉夫实施的武器禁运的影响。不幸的是,这项措施在前南斯拉夫其他的地方并没有产生理想效果,相反,它使得侵略受害者无法有效地进行自卫。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早该重新审议这项措施,并根据现实作出调整。

世界所面临的所有这些新难题,都要求改革联合国的结构和机制,我相信持有这种观点的不只我一人。大会应该为处理各种局势更充分利用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并采取步骤解决国际关系中的各种问题。鉴于世界上新情况和目前问题的性质,安全理事会似乎也需要作出若干改变,以便使它能够更灵活和更有效地作出反应。适当增加其成员将是十分明智的,其目的是使它更加具有代表性,并加强其通过大会对联合国各会员国所负有的责任。另外,可以设法加强秘书处的专业能力,从而改善秘书长从事有效业务活动的条件。在世界目前状况下,我们大家都同时面临着本来令人欢迎的各种变革可能带来的危险后果,以及众所周知的发展中国家日益堆集如山的问题。这种状况当然要求提高现有或新的机制的效率。这意味着解决联合国经常费用筹措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

副主席皮尔苏先生(格林纳达)主持会议。

在结束时,可惜我不得不还要提及一项长期以来已经使国际社会不安和担心的问题:前南斯拉夫一些

地方的危机。斯洛文尼亚尽管邻近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武装冲突地区,但没有直接卷入成为过去两年来武装冲突起因的问题。当然,这不是说斯洛文尼亚人民和斯洛文尼亚政府是无动于衷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尊重制裁,并且与国际社会的所有努力合作,为这些国家带来和平。我们提出了缓解危机的建议,寻求政治解决,结束战争和痛苦。不幸的是,战争仍然在继续。我们由于有七万难民生活在斯洛文尼亚而不断地被提醒到这一事实。照顾这些难民对于两百万斯洛文尼亚居民是个不小的负担,尽管我们有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合作。但是,国际上对难民的援助正在减少。

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是遵守冷战之后国际秩序以其为基础的所有原则。这将鼓励新成立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遵循这些原则,并如同在前南斯拉夫领土上建立的其他国家一样,根据《宪章》争取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前南斯拉夫所有成员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对前南斯拉夫的继承权问题进行谈判来满足。

斯洛文尼亚现在和将来都将支持为开创一个使子孙后代充满希望的更美好的世界所采取的一切行动,这个世界的整个国际社会具有共同的利益,没有战争的恐怖、贫困与社会问题,一个人权和每个人的尊严是所有政府尊重的标准的世界。

我祝大会在本届会议上为这一目标而努力取得圆满成功。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总理刚才的讲话。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总理亚奈兹·德尔诺夫舍克先生在陪同下离开讲台

萨塔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我极为高兴地

向大会主席表示巴基斯坦代表团祝贺他当选为第四十八届会议的主席。他的外交才干与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在联合国的经验将是大会这次重要会议成功的宝贵财产。

我们也向上一届主席斯科托·加内夫先生为指导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而作的令人难忘的贡献表示赞赏和感激。

应当特别赞扬联合国组织的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献身精神和干劲。我们赞同秘书长的意见,发展与民主是相互联系的,而且“全球合作性的一体化现在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也是全世界人民的要求。”(A/48/1,第13段)。

巴基斯坦高兴地欢迎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厄立特里亚、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摩纳哥公国及安道尔公国成为联合国组织的会员国。我们期待在实现联合国的目标的努力中与这些国家密切合作。

为此目标,并为了《宪章》的崇高理想,巴基斯坦自其独立以来就作了承诺。我们始终力图遵守其原则,我们重申我们对其无时限地适用的信念。巴基斯坦过去以及将来都与其他国家全心全意地合作,开展旨在实现启发了建立联合国的理想的共同努力。

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回顾历史让人百感交集。联合国组织的失误和不作为使人难忘并且使人不快;但是联合国各会员国也有许多可以庆祝的事情。在这几十年内的一些成就是巨大的。

130多个国家走出了殖民主义与外来统治的黑暗时期,每个国家都以其独特的才华丰富了世界的文明,并促进了人类尊严的事业。

一场大规模核战争的恶梦避免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正被削减。意识形态的角逐与对抗转变为和平与合作。

民主继续取得胜利。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人民实现了经济和社会进步,以及在和平与自由的环境下提高了生活水平。

在乐观主义的时刻,我们甚至看到了一丝新的晨曦,看到了更加公平与安定的时期——权力变得文明了,各国间的分歧与争端不是通过侵略或者恐吓来解决,而是以和平的手段在法律与公正的基础上如同个人之间的分歧与争端一样来解决。

这种前景令人响往的接近,但是我们仍然还不能实现它。世界社会走向和平与繁荣的进步是缓慢和曲折的。我们目睹了许多挫折与反复。在这种时候,和平的前景似乎远远地退到地平线后面去了。

对基本权利的尊重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一些国家对国际准则表现出公然的无视与轻蔑,允许甚至鼓励其部队犯下野蛮的行为,凌辱了正人君子的良知。

在一些国家,不是促进礼貌与容忍的作法,相反地却鼓励沙文主义与偏执和仇恨的罪恶。其结果是对少数的屠杀,对其宗教礼拜场所的破坏与焚烧。

世界上被迫逃离家园成为难民的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使向其提供救济的资源日益缺少。

贫困的问题也加剧了,有10亿人生活在赤贫之中,没有足够的食物与住房。对于他们,生活是短暂和残酷的。

显然,联合国还要走很长一段路,还有许多旧的和新的障碍要克服,才能实现《宪章》为其制订的目标与宗旨。但是尽管我们在考虑众多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从最近的成功中得到一些安慰。

柬埔寨发生了惊人的转变,柬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力机构(联柬权力机构)在这一转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秘书长特别代表明石康先生及其合作者所作的值得赞扬的贡献使本组织及其会员国感到满意。巴基斯

坦致力于促进和平与稳定,很高兴在这一过渡时期向联柬权力机构提供了1 500名人员。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同以色列签署的《原则宣言》是一项积极的文件。如果忠实的执行,它在历史上将成为朝着中东和平与共存迈出的重要的第一步。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公平解决悬而未决问题对实现这一目标极为重要。圣城地位仍然是我们巴勒斯坦人以至全世界穆斯林关心的一个关键问题。

我们希望,在挪威值得赞扬的贡献下制定的《宣言》和约旦同以色列商定的议程将推动中东全面和平的谈判,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为这些谈判提供了商定的必要基础。

在阿富汗,圣战领导人的妥协和联合政府的组成令人感到满意。和平的巩固将使阿富汗人民能够享受他们划时代的胜利成果。同时,需要立即着手重建这一饱经战祸的国家的方案。提供就业机会将加强和平进程。巴基斯坦准备同国际上一道努力参加阿富汗的重建。在有利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出现之前需要援助150万仍然留在巴基斯坦未能返回家园的阿富汗难民。

南非的政治演变为其所有人民带来了受欢迎的和平与自由的希望。他们和全世界对勇敢的自由战士和政治家纳尔逊·曼德拉的英明领导表示庆贺。巴基斯坦将积极响应他有关让南非返回国际大家庭的建议。一个多元民主政府可望建立。巴基斯坦期待着同新的南非发展密切和友好的关系。

在索马里恢复法律和秩序并恢复其政体的努力也取得了可观的进展,尽管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进程是缓慢和痛苦的。我们巴基斯坦人深感悲痛的是我们的部队由于某个索马里派别的错误行动而承受了重大伤亡。然而,巴基斯坦不会抛弃联合国特派团。我们的分遣队将继续高举联合国的旗帜,协助救济行动和促

进恢复索马里的和平与和谐,因为我们对该国人民怀着诚意和兄弟友情。

我们欢迎莫桑比克、利比里亚和卢旺达取得的进展,而且我希望能够执行有关决议的文字和精神。必须扭转安哥拉不幸的事态发展。我们敦促有关各方进行对话和实现全国和解。国际社会必须协助这些国家恢复和平与正常秩序。

冷战结束带来的乐观已经由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巨大悲剧而黯然失色。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被武力瓜分,其人民遭受野蛮的侵略和冷酷的种族灭绝。对人类犯下罪行的程度是反犹太屠杀以来从未见过的。人类的良知对此感到愤慨。然而,国际社会未能采取行动捍卫一个小国。相反,它却成功地剥夺了一个国家自卫的固有权利。实际上,安全理事会的某些成员甚至阻止协助侵略和屠杀受害者的行动,同时完全知道侵略者正在受到其同民族的邻居的协助和怂恿。

波斯尼亚人的手脚被绑住,被迫谈判一项所谓的协定。他们被迫接受一项无视公平和甚至安全理事会决议的绝对命令。这项计划将奖赏侵略和使以武力夺取领土合法化,它不能也不应当获得国际社会的赞同。

大会尽管在这一最后时刻,还是能够采取行动挽救世界人民对联合国寄予的希望。它必须大声捍卫法律和正义,以维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主权,确保其不同种族团体之间领土的公平分配;加强联合国的部队,使其能够维持和实施和平;保护安全地区,在冬季严寒即将到来之前提供救济品防饥防寒;并惩罚那些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犯下野蛮罪行的罪魁祸首。

阿塞拜疆是另一个侵略的受害者。亚美尼亚人占领了阿塞里领土并把数十万人赶出家园。我们要求停止这一侵略和撤出亚美尼亚部队。而且,阿塞里难民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以解除他们的痛苦。

克什米尔的危机要求联合国采取紧急行动。印度在该被占领的邦进行残酷的恐怖和镇压统治,恶毒地企图迫使克什米尔人民屈服并阻止他们为了实现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而进行的合法斗争。这当然是一种固有的权利,但是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巴基斯坦、印度和联合国对此曾作过具体的保证。它已庄严载入安全理事会有关克什米尔的各项决议。

在国际上受尊敬的非政府人权组织已经详细地记录了印度占领军犯下的野蛮罪行。

自从1990年以来,大赦国际一直报告印度军队在克什米尔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任意监禁、殴打和杀害被拘留的克什米尔人的作法,以及把强奸作为一项政策。

“强奸并不少见,有证据说明这被作恐吓的手段”,在1992年9月曾访问克什米尔的一位牛津大学讲师P.M.万达拉扬先生说道。巴黎的国际人权联盟发表了他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回顾:

“印度和国外的报界广泛报道印度军队在库南波针波拉进行的可耻的集体强奸。迄今为止,这是安全部队对该地区妇女犯下的最为恶心的野蛮暴行的例子”。

这是最令人恶心的,但绝不是孤立的事件。

报告中还记录了人们“失踪”的案件,“每天在克什米尔遭受酷刑”的年轻男子,以及“惊人地司空见惯的”法外或非法处决。

国际人权组织和权威报纸发表报告的标题本身描绘了克什米尔的严重情况。1993年发表的报告的题目和标题有:蒂姆·高普西尔代表英国议会团体发表的报告——“烈火中的天堂”;1993年1月17日一家伦敦星期日报《观察家报》——“印度的耻辱”;亚洲观察和支持人权医生协会——“克什米尔的镇压——对被拘留者

施加的酷刑和对医务界的攻击”；国际支持人权律师联盟的报告——“印度安全部队在印度管理的克什米尔犯下的法外处决、强奸、任意逮捕、失踪和其他侵犯基本人权的罪行”；同一组织的“印度安全部队在查谟和克什米尔侵犯人权行为”；亚洲观察和支持人权医生协会的“克什米尔的强奸：一种战争罪行”。

纽约和华盛顿的人权观察组织的一个分支亚洲观察和波士顿的医生支持人权组织1993年6月发表的报告的结论是：

“为了粉碎克什米尔军事分裂运动，印度政府军有系统地违反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其中最恶劣的是草率处决在克什米尔治安部队看管下的几百名被拘留者。这样杀人是按策规定的……

“酷刑的方式包括严刑拷打、电击、用脚或手把人悬空吊着、把腿拉开、用很烫的物体烧伤、性骚扰和心理折磨和侮辱。一种常用的酷刑方式包括用沉重的木质滚轮压碎腿部肌肉……”。

在1990年1月印度开始野蛮镇压以来的近四年时间内，已有成千上万的克什米尔人被印度军队所杀害。还有许多人成为残废和失去活动能力。

任何数字都无法说明或描绘一个人民的痛苦，但他们确实证明了该人民恢复他们生而有之的权利的钢铁意志。现在，这场已经进入第四年的克什米尔斗争将继续壮大其内在的力量。它也无疑证明，克什米尔人民没有而且不会屈服于印度的占领。他们没有而且不会接受印度的统治。

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和它在被占领领土上的政策，从根本上蔑视国际法和德道。印度声称，查谟和克什米尔是印度的一部分；这种说法在法律上和历史上没有根据。这个邦的未来仍然有待决定。安全

理事会关于该问题的各项决定，规定就该邦加入或巴基斯坦的问题进行一次全民表决，但这些决议还没有执行。不能允许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拒绝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而且，这里所涉及的决议巴基斯坦和印度都已接受。法律不允许一方单方面赦废一项国际协定。

克什米尔人民恢复自己选择自由的斗争，是争取一项基本权利的正义斗争。它应该得到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支持。作为争端的一方，这种支持对巴基斯坦来说，既是义务，也是权利。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继续坚定地尊重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坚决支持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利。巴基斯坦呼吁印度履行它法律所规定的义务。我们请联合国所有其他会员国采取适当行动，制止印度在克什米尔践踏人权，确保安全理事会决议得到执行。

最近的报告说明印度部队在克什米尔践踏人权的情况有惊人的升级。为了调查这一人权紧急状况，上星期我们给安全理事会主席写了一封信，并重申了我们的建议，即派遣一个调查团前往查谟和克什米尔。如果印度没有东西要掩盖，它就应该接受我们的建议。

同解决冲突一起，裁军为各大小国家提供了一个加强安全、扩大区域和全球和平疆界的现实办法。冷战的结束已经排除了核决战的威胁。我们欢迎关于削减战略武器的各项协定。即使这样，核武器国的武库中还有数以千计的核武器。我们希望他们能采取行动，进一步削减并最终消除所有核武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应该重新开始有关在一个具体的时间范围内实现核裁军方案的工作。

在实现核裁军之前，无核武器国家有权利要求有核武器国家保证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依靠对对方的核威慑来保证安全的对立的军事集团的消失，应

该使核武器国家能够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20多年来,巴基斯坦一贯主张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因此,我们高兴的是,为缔结这样一份条约的谈判将在日内瓦开始。巴基斯坦将积极参加这一努力。我们还一贯支持全球性禁止裂变物质的生产,这种禁止应该是在非歧视性的。

区域性办法已经证明是促进核不扩散的一种有效途径。无核武器区的概念正终将成为现实。拉丁美洲无核武器区今年已经生效。巴西和阿根廷也已为不扩散达成了相互安排。南非核武器方案的根本转变,已经为在非洲建立一个无核武器区创造了条件。在中东,争取和平的进展,也可能为不扩散创造政治势头。

不幸的是,当印度1974年爆炸一枚核炸弹时,南亚不扩散的希望受到严重挫折。然而,巴基斯坦继续主张在东南亚努力消除扩散的危险。为此目的,我们已经提出了几项建议。其中包括建立一个南亚无核武器区;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时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由这些国家相互核查对方的核设施;缔结一项双边核禁试条约;召开一次由印度、巴基斯坦、美国、俄罗斯联邦和中国参加的会议,拟定我们地区不扩散和安全安排。遗憾的是,这些建议迄今还没有被接受。

常规军备也可以在区域范围内得到最有效的推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应当制定原则,在常规领域中促进这种区域军备控制和裁军。联合国军备转让登记的试验已经证明是成功的。巴基斯坦已就本国的军备采购和销售,提供了所需的资料。然而,这一登记册未必能反映各地区和平所面临危险的全貌。只有在同时考虑到军备转让和本国的军备生产的情况下,为军备平衡和不平衡才能作出全面的评估。

为了促进和平与繁荣,必须便利而不是限制利用现代技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联合国应考虑对应用先进技术 in 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人为设置的各种障碍,准备一次全面的研究报告。

过去几年的全球衰退,已经给许多最贫穷的国家,特别是其中最穷的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困难。生活在赤贫状况中的人数不断增加,威胁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国际社会应该把一项全面发展方案放在高度优先的地位。

必须抵制保护主义的势力,乌拉圭回合必须在1993年年底结束。应当向正在执行具有深远影响的经济改革和自由化措施的那些发展中国家提供充分的官方资源。非洲走头无路状况下的需求应紧迫注意。应该提供新的官方援助,特别用以在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推动人力和社会发展方案及可持续性增长。

发展中国家需要迫切解决其来势凶猛和无法支撑的人口增长的问题。我们非常欣赏联合国人口基金不知疲倦地主任纳菲斯·萨迪克先生的献身精神及其所作的努力。我们希望,即将在开罗召开的人口大会将制定出一项全面的长期战略,以应付人口不断膨胀的挑战。同时,世界儿童的需要必须在国家和国际议事日程中占优先地位。

随着铁幕的崩溃,在创建一个以市场原则为基础的真正的全球经济方面已没有任何政治或意识形态的障碍。我们希望,区域经济集团将为全球经济互动和一体化创造势头,而不是适得其反。巴基斯坦地处南来、中亚、西亚和海湾的十字路口,能够在这些邻近地区间开展互利的经济、商业和工业合作方面发挥纽带作用。

联合国是世界各国可以协调其政策以建设全球和平与进步新结构的唯一论坛。秘书长已在其题为“和

平纲领”的报告中指明了方向。

《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解决争端和冲突的机制必须得到加强。同时,安全理事会必须表现出更为统一和前后一致的决心,执行其自己的决定和决议。只有这样,集体安全的目标才能成为现实。

巴基斯坦同意需要适当地增加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以加强其代表性。安理会的程序也应更具透明度。改革的指导原则必须是民主和会员国主权平等。我们不能把特权地位给予那些曾经违背《联合国宪章》原则和拒绝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国家。

对联合国在维持和平和缔造和平方面提出的要求有了很大的增加。今天,有八万名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正在开展大约17项维和行动。其使命经常是既艰难又危险。但是,联合国会员国必须接受风险,协助受比较强大的邻国和敌人威胁的各个国家和社区。巴基斯坦是向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提供人员最多的国家之一,目前6 000多名巴基斯坦人员正致力于联合国维和行动。

如果要联合国履行其越来越繁重的责任,就必须向它确保稳定和充足的资源,以支付其行动的费用。其他选择办法的代价比维和行动要昂贵得多。

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应成为分水岭,即从冷战的习惯过渡到这一个新的多极化时代建设和平和普遍繁荣的努力。要使这一努力成功,我们必须制止危险的民族和种族冲突及争端的扩散,确立人权、民主和自由的至高无上地位,预防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并走向核裁军和常规裁军,并制止贸易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力量,以促进全球的持续发展。

联合国会员国面临的挑战确实很艰巨。但是,实现真正和平与普遍繁荣的机会也非常充满希望。各会员国通过善意与合作可以在本次大会期间在实现《宪章》设想的和平、进步和人类团结等理想方面取得长

足的进展。

索拉纳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联合国已走上了一个不可逆转的深刻变革进程。效率和灵活性将是这一进程的突出特点。但是,一个有效的联合国必须继续为和平与发展服务。

下个世纪的联合国不管多么有效绝不能成为平衡强国利益的机制。本组织必须向前推进,成为世界促进发展和各国及人类团结的主要工具。

本组织首先是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机构。除了反映各会员国在此表达的意愿之外,它没有也不能反映任何其它意愿。在过去四年中联合国会员国的急剧增加是非殖民化时代以来从未见过的现象。这一现象突出了本组织的上述特点,也是我们各国对联合国抱有信心的证明。

目前,国际社会想把原来纯粹属于国家内部管辖范围的某些问题国际化。作为一个深知其国际责任的国家,墨西哥所采取的行动符合这一新的协商一致意见的要求。但是,我们必须反复强调,我们反对在损害国家主权的情况下发展国际行动的想法。

在此所代表的各国人民都必须参与确定本组织的未来。墨西哥认为,进行任何改革都是加强本组织民主生活的历史性机会。

安全理事会公正代表性问题在本组织改革中发挥核心作用。目前,就增加安理会席位的必要性已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在1945年,联合国会员国只有51个,而今天有184个会员国。因此,我们或许应至少把安理会的席位增加一倍。但是,光靠增加席位是不够的。

安理会的改革必须首先考虑安理会缺乏其自身权威这一事实。它采取行动,是因为我们作为主权国家决定授权安理会处理维护世界和平这一微妙的任务。在考虑安理会构成这一问题时,必须顾及确保安理会

行动合法性和透明度这一压倒一切的需要。

应成为安理会成员的是那些对维护和平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而不一定是那些世界上最大的武器生产国和出口国。开展维持和平行动不仅仅是提供武装力量供安理会支配的问题。我们必须承认促使国际争端和平解决的所有国家的努力。安全理事会最近经常采取的行动倾向于掩盖一个事实,即我们的首要义务是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分歧。

一个代表性的机构必须是民主的。否决权是不民主的,因此墨西哥从未对此予以支持。我们必须一道寻求新的方法以控制对该权力的行使,并确保没有任何常任理事国能够单独决定或阻止安理会的行动。

安理会工作方法的透明度,将使大会恢复从其普遍性和多元性中获得的首要地位。我们建议成立一个大会工作小组,以就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各个方面提出建议。

近年来,维持和平行动大幅度增加。这表明世界尚未能够解决其最紧迫的问题。

民族主义继续存在。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正在抬头。赤贫现象有所增加。

墨西哥认为,维持和平行动是控制冲突局势影响的极好手段。这种行动的存在,为通过和平手段求得政治解决创造了条件。它们是和平的机会,然而并非和平的本身。

安全理事会在决定确立维持和平行动之前,冲突各方必须已予以同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保障各国主权的不可侵犯性以及对其国内管辖的尊重。

明确任务也是不可缺少的。正是由于其职能变得多样化,头戴蓝头盔的士兵们必须具有明确划定的活动领域。我国政府关注的是,这些部队人员的活动范围可在原地扩大,而其职权范围则与基于《宪章》第七章所

概括的执行措施的其他集体行动相混淆。

在索马里,联合国部队只应确保国际人道主义援助送到意图中的受益者手中。国际社会对维持和平行动及人道主义救援的支持,取决于其公正性和透明度。

墨西哥紧急呼吁各会员国立即规定标准,以制约维持和平行动的确立和运转的各个方面。

任何力量都无法取代寻求解决国际争端的政治意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以色列国之间就被占领土自治问题达成的协议体现了这一点。墨西哥祝贺有关双方、以及帮助它们取得这一政治智慧、协作与尊重另一方权利的巨大成功者。武器正让位于理智的制约。各国人民的自决和每个国家生活在安全和被承认的边界内的权利——这些是墨西哥一直赞成的原则——正开始在中东变得越来越强大有力。

同我们在中东看到的希望迹象相对比,在前南斯拉夫实现和平的努力明显失败。和平计划一个接一个,然而无辜人民遭杀戮和经受痛苦的情况却没有结束。墨西哥敦促冲突各方就具体的建立信任措施取得一致。这些措施将使达成广泛持久协议所需的条件得以建立。

墨西哥欢迎美国、法国、联合王国和俄罗斯最近单方面延长暂停核试验。该决定将使裁军谈判会议能够最终开始批准一项彻底禁止这种试验条约的谈判。我们希望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核大国都参加这种暂时禁试。

这个从一开始就受到我国的启发和鼓励的历史性决定,将是防止核武器扩散方面的一个重要步骤。墨西哥强调谈判的优先性,既因为其本身原因也因为它们将对下一届《不扩散条约》审议会议产生的影响,该会议将决定这一重要的国际文书的未来。对墨西哥而言,彻底停止核试验与不扩散制度的命运之间的联

系是密不可分的。

国际社会现在必须面对另一种危险：毒品。它们现已成为历史上最大的非法行业，夺去人民的生命、腐蚀正常秩序的力量并破坏政治体制，它们甚至能够影响各国的稳定。

我们不能质疑《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价值，这项文书一直指导国家的政策并协调国际合作。某些地方和全国性的斗争因而获胜。然而这场战争尚未获胜，它现已成为一场世界性战争。

鉴于肮脏的毒品行业在全世界无法控制的泛滥、消费、生产和贩运，以及有关的所有非法活动，我们必须对我们所遵循的战略的无效性进行思考，必须采取一种新的方法。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政治决心，提高想象力和战略创造性，以及首先加强国际合作，在合作中要尊重主权，而且任何人都不可自满偷越，以便制止这种可怕的社会癌症的增长。

我们时代的另一个中心问题，是在本世纪即将结束时正以新的活力展开的巨大的移民潮。大规模的国际移民是财富与福祉两极分化的结果。它们是影响整个世界的问题，超出了各单独国家采取行动的能力。我们需要新的国际合作方案，以寻求解决与经济发展不足有关的苦恼问题。

整个历史中的每一次移民潮都有其原因，而原因则不一定互相联系。然而，它们总是包括寻求更美好的生活这一条。世界结构的变化既是对移民的制止，也是对它的鼓励。1989年，世界人口的1% 5 000多万人——在其原籍国之外生活。仅在三年之后的1992年，这一数字增长了一倍。在1990年初，世界难民的人数已达到1 700万。

那些由于其经济发展和社会和平而似乎能够接受

新的移民群的国家，今天正经历内部的冲突，这种冲突有时表现为种族和宗教上的不容异己。

在这一项对世界上的权力和平衡作新的调整的艰难过渡时期中，国内紧张情况、保护主义趋势、全球衰退以及众多国家的解体，一道使某些国家认为移民的现象是对其国家安全的威胁。

让我们通过采取治标的限制性措施避免这种现象把我们压倒。

墨西哥建议大会尽快开始认真考虑这一议题。

任何国家的国家计划必须建立在有可能使其居民以有尊严的方式在其本国内生活的那些政策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全体各族人民不会企图为了寻求更好的经济机遇而去国。贫困在世界所有地区都增加了。只要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最富有的人代表了83%的总收入，我们在经济合作方面的努力就将失败。

拉丁美洲的国家和中欧以及东欧的国家作出特殊努力进行内部调整以实现近几年以前甚至难以设想的经济改革。然而，临界贫困的问题不能听任市场力量的摆布。在墨西哥国家没有放弃其社会责任。我们确实在团结的基础上加强了我们的发展政策。

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总统一再说，为了巩固调整和经济稳定的任何计划，推进各项社会计划是必不可少的。他还强调，从长远的观点看，教育的扩大、现代化和恰当方向是增加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唯一办法。

1995年召开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表明联合国承认国际议程上这一项目的优先性质。墨西哥已经热情地参加了关于这一重大事件的筹备工作。

今年在维也纳举行了世界人权大会。所达成的各项协议一定导致加强业已存在的各项法律文书。参加

大会的各个国家表达以不挑三拣四、怀着客观性和尊重普遍性的方式履行这些协议的政治决心。这是保护和促进世界各地人权的一个根本方面。墨西哥愿在大会面前重申,对人权的充分尊重要求我们将我们的努力针对最软弱的群体:那些居住在贫困条件下的人、难民、少数民族、民主以及生活和文化需要得到尊重的所有那些人。

墨西哥同美利坚合众国和加拿大的总贸易额相当于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0%。为此原因,它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及其它类似协定。在此基础上,我们希望推进、调解和确保三国间贸易往来、服务和投资。在一定时间内这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3亿6千万人民,产值为7万亿美元,这是一支对世界经济有着主要重要性的前进力量。

但是墨西哥也是拉丁美洲的一个实质和引以为自豪的部分。我们同拉丁美洲有着文化联系和历史联系。我们对我们同中美洲以及加勒比各国的合作给予优先重视。我们积极参加《里约集团》和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拉美经济体系)。我们同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一起参加了同三国集团就自由贸易举行的谈判,我们希望今年将完成。我们同智利已有一项协议,该协议自1992年1月起已经存在。我们也正同该地区的其它国家进行会谈。

我们积极参加伊比利亚-美洲国家会议,它正在取得有利于美洲和欧洲21个讲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国家组织。

作为一个大西洋国家我们感到同欧洲十分密切,在那里,有我们的主要伙伴和朋友。我们对欧洲共同体特别感到亲密,我们同它保持对话。

我们也是一个太平洋国家,我们大大增加了在亚洲的代表的人数和贸易。我们感谢亚太经济合作理事会

的各国所给予我们的支持以帮助我们不久加入该机构。

我们还受到经济合作和发展机构24国的邀请(经合发组织)。我们感谢这一邀请。我们正在制订我们加入这一有声望的机构的细节。

我们祝贺南非领导人德克勒克总统和纳尔逊·曼德拉所达成的各项协议,我们准备立即同该共和国开始全面关系。

我们承认并全力支持海地所作的努力。我国大使现在已经回到太子港。我们重申,我们对秘书长作出的关于为海地的全面恢复提供技术和经济资源的建议。

我们愿继续成为每一个是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的可尊敬的朋友。

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总统外交政策的中心点是使我们同世界所有地区和国家的关系多样化和深化。

墨西哥已经开始为纪念联合国50周年进行准备。在我国,这将不会是举行毫无意义的庆祝和摆出自我祝贺姿态的时刻。我们正在作出认真努力,以便认真考虑本机构的未来。我们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在未来的世纪中,我们要联合国履行何种职责?所有其它问题都将随之添附。

如果我们真有机会——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人们常这么说——将本组织变为一个真正新的、更为公正的国际秩序的基石,那么让我们采取行动吧。

科伊曼斯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向英萨纳利大使阁下转达我对他的祝贺,祝贺他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八届常会主席。联大本届常会是在这样一个时刻举行的,即要求联合国在许多领域发挥建设性作用。帮助回答这一挑战的艰巨任务落在他能干

的双肩上。我要祝愿他圆满完成任务,并且促请荷兰王国代表团的大力支持。

世界正在巨大地希望和巨大的痛苦之间保持平衡。围墙不仅仅在欧洲倒塌了。在中东,两个勇敢的领导人拉宾总理和阿拉法特主席已走上了他们两个人民之间的和解的道路。在南非,曼德拉先生和德克勒克总统在同过去决裂和引进一个新的民主的南非时也表现了同样的勇气。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暴力正在擦破地球的脸面。从安哥拉到波斯尼亚,村庄被摧毁,无辜的人民遭到惨忍的屠杀。

俄罗斯未来对我们的各种希望也是关键的。一个本身是和平的对其邻国也是和平的民主的俄罗斯是国际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俄罗斯,我们也等到一位勇敢的政治家企图同过去决裂:波利斯·叶利钦总统。我同其他许多人一起表示我全力支持他为了巩固俄罗斯的民主所作的努力。

冷战的结束带来了塑造一个更公正和和平的世界的历史性机会。如果我们听任这一机会从手边溜走,历史将对我们作严万厉的评判。

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涉及一系列的努力。人们目前广泛意识到,“安全”不能仅仅从军事或政治军事的角度来看。对安全需要作出更广泛的定义。实际上,去年安全理事会的最高级会议强调,经济、社会、人道主义和生态领域的非军事的不稳定根源也会威胁和平与安全。对国家间和国家内冲突的传统划分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国家内的流血最终会蔓延到国境线之外。这当然引起了主权问题。在相互依存关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加强的时代,我们如何来界定主权?主权自然是国际法的一个重要原则。但这一原则不应用来保护独裁者关起门来屠杀自己的人民。也不应用来永久延续一个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国家的大规模苦难和死亡。有时国

际社会确实负有进行干预的道义责任。也有时,在这样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联合国必须在事实上行使主权,以利这一国家的重建。我们希望这一点将在索马里取得成功。柬埔寨目前的事态发展使我们感到振奋,它证明这项雄心勃勃的事业可以取得成功。

安全理事会近来的一系列决议为扩大国际责任,以坚固索马里和波斯尼亚一类国家的苦难奠定了新的基础。因此,究竟哪些因素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其定义已经逐渐扩大了。

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最近在魁北克的发言中谈论了“国家内的冲突局势”问题。他说:

“今天,这些新的冲突对国际和平造成了最严重的威胁,给个人权利带来了最严重的损害”。

在讲话中,秘书长呼吁“新的民主和人权外交”。我认为,这一想法是对我们的“和平纲领”的宝贵补充。

请允许我在这里提及联合国人权会议,会议为改进人权保护开辟了新可能。在艰难的起步之后,会议的结果当然令人高兴。最后文件载有关于今后步骤的一些重要建议,现在应当付诸实施。

因此,荷兰王国希望强调会议对秘书长和大会的紧急呼吁,即大幅度增加联合国人权中心的资金。尤其重要的是,应当在大会本届会议期间,设立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职位,并大体划定其职责范围。本届会议还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机会,通过建立国际战争罪法庭,解决最为凶残的一类侵犯人权行为,即严重战争罪。荷兰王国以其在国际法领域的悠久传统,自豪地被请求将该法庭设在海牙。

请求联合国肩负更多的责任强调了对合法性和效力两方面的要求。这使我们深入涉及到关于扩大安全理事会问题的辩论。显然,我们必须谨慎,不要使安全

理事会因过于庞大而损害其决策能力。然而,我赞成扩大安理会,纳入一些大国,只要他们愿意并且能够分担因其会员资格而产生的集体责任。

“和平纲领”要求我们对维持和平与安全保持更广阔的视野。必须强调,针对一场危机,需要极早作出警觉,极早采取行动,最好是能够采取预防性行动。前南斯拉夫和世界其他混乱地区的事态发展再度表明,越是长时间容忍一场危机,危机就越难以控制,而行动的代价也就更高。

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尝试重新思索各种危机控制手段之间内在联系。外交努力、经济制裁和军事压力不一定应当看作是循序渐进的,而应当看作是交织在一起的一整套手段。制造和平、维持和平和冲突后缔造和平要求联合国采取各种手段包括人道主义和社会经济领域的手段。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在数目和范围上的极巨扩大,使我们面临一场艰巨的任务。此外,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行动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以往,维持和平行动往往是在安定的环境下进行的,当事各方都受益于范围有限的维持和平任务。现在,维持和平人员往往是在敌对气氛下行动,当事的一方或更多方对联合国的存在及其使命感到不满,这就意味着,今天的许多行动使联合国人员实际上面临着人身危险,不管他们是文职人员还是军事人员,而他们的特权和豁免权经常受到侵犯。联合国旗不再必然受到尊重,这就直接影响了联合国的信誉。因此,目前的授权与以往相比趋于强硬,往往明确依据《宪章》第七章。

维持和平行动的特点有了变化,要求有关人员具备不同的资格。训练有素的士兵通常有能力执行这项任务,今天,我们还需要后勤方面的专业单位、具有多国行动经验的参谋人员、扫雷专家等等。在文职人员方

面,警察、电力专家、管理人员和人权专家对一体化行动是必不可少的。

联合国尤其在进行和平行动时,资源需求不断增加,这使联合国几乎耗尽其组织和财政资源。这就意味着,今后,联合国将更多地依赖区域组织和结构,执行维持和平行动和其他任务。《宪章》对此作出了规定,秘书长在其“和平纲领”中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一方面,这将使联合国免除一些义务;另一方面,这也将使冲突当地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区域组织和结构更有效地推动解决有关问题。

并没有标准说明这些相互关联的机构应该怎样配合,而每一件事应当单独审议以决定什么样的合作方式才最为合适。

荷兰王国一贯努力为和平行动作出高级贡献,我们作为联合国的成员致力于此。目前荷兰武装部队的改组就特别是要使之适合保证我国更广泛、迅速和有效地参与今后的维持和平行动。

荷兰认为,适当的准备和有效的监督对和平行动的成功至关重要,并相应地为联合国提供了一批军事指挥员。

随着和平行动数量和规模的增长,秘书处的支持也需要增加。秘书处应能同维持和平任务的需求成比例地扩大与收缩。凡是需要扩大的时候,应当在早期阶段进行。实际行动之前的准备、计划和预算正是保证它成功的基本因素。目前向大会提出的建立新的和平行动的预算并不充分。这不仅使成员国难以对支助行动作出决定还表明在提交预算的时候对建立行动的途径并没有完整的规划。显然如果和平行动数量减少,秘书处也就不再有必要保留多余的人员。我的意思是任何补充应当是暂时的、灵活的和及时的。

适当的计划和训练、充分的人员和令人满意的监

督水平——所有这一切都是和平行动取得成功不可缺少的，除此以外，重要的是，联合国和平部队要能在决定部署后尽快到达现场。否则，就有恢复敌对行动的危险，以至于在部队到达位置之前失去成功执行安全理事会任务的基础。因此如果要避免使用更多的力量，关键在于速度。

只有明确掌握短期内能向联合国提供的部队才能做到这一点。为此，荷兰欢迎建立预备队计划组，从事制订一个概念并为迅速部署部队形成一个储备。荷兰也同意在1993年底说明荷兰那些部队可以作为预备队。当然，有关部队可能部署的最后决定在于荷兰政府。

只有高标准的经营、管理和可靠性，才能满足对联合国体制的不断增长的需求。确定并维护这些标准的责任首先在于我们这些会员国。我们的责任是要明确指出优先事项，保证不同的联合国委员会和管理机构所作决定的一致性，并为拟定的优先事项提供必要的财政资源。

许多对本组织的批评表明确实有必要改进秘书处的职能和管理。但批评中有一部分的根本子在于会员国履行职责的方式，各国政府未能制订优先事项，通过的决议目标不明确并且未能交付分摊会费，这些都不能指责秘书处。

我坚信，联合国绝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是献身和忠实的国际公务员。我们要对他们表示尊敬。在从直接提供医疗保健到不扩散核武器等等领域中，他们中许多人在艰苦的条件下工作，有些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

然而除去人员的素质和忠诚之外，秘书处应当仔细地考虑它自己的管理格局。在联合国的词汇中，重要的词句例如目标管理、公开性和可靠性必须成为日常用语。必须赋予基层经理更多的职责并使之对实现

预定目标负责。

此外，秘书处还应应对批评以更令人满意的方式作出反应：首先是要保证合理批评得到反应并不予延误地采取纠正措施；其次是对错误的指责予以立即拒绝。总之，联合国的公共关系需要改善。

秘书长为改组秘书处采取了一些令人赞赏的行动。第一步变革是在政治部门，而今年社会和经济部门也进行了改组。改组为加强有效性和协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还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重要的是要保持势头并向联合国工作人员提供明确的情况。他们不应该对自己的未来位置和改革的方向一无所知。迟迟不去的不稳定性影响了工作人员的士气并从而影响了他们的效力。

我已经说过，会员国有责任为拟定的优先事项和要采取的行动提供财政资源。联合国不能束手缚脚运转。本组织年复一年地长期拖延，收不到分摊的会费。其结果是要采取的行动只能部分地得到执行或是长时间拖延。而在维持和平领域中，提供部队的国家却不幸被迫做好准备并为维持和平行动提供长期预先财政援助。

会员国中这种缺乏纪律的情况迫使秘书处花费大量精力去解决平凡发生的周转问题。令人心痛的怪现象在于秘书处相对成功地利用束手缚脚的预算似乎反而助长了会员国进一步违反付款的纪律。此外维持联合国运作的负担现在不公正地落到了那些及时和完全地交付了会费的会员国身上。

有些会员国看来是用部分交付会费来表示他们对本组织某些方面工作的不满意。但联合国不是一份按单点菜的菜单：不满意应当在辩论中提出，要通过论点的份量而不是不交付分摊会费来表示。

在本届会议上，我们将审议沃尔克-绪方关于资助

联合国系统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中显然有许多长处,但总的说来他们只能有助于减缓现存问题;他们并没有触及问题的中心。解决本组织财政问题的唯一办法最终在于全体会员国及时并完全交付分摊会费,这一点必须反复强调。

虽然我们坚持认为各会员国履行其财政义务,我们也期望秘书处有效率地利用其财政资源。一些会员国还建议设立新的财政监控机制。这些建议可能有其优点,但我们不应忽略的是,目前已经有一些监控机制。我认为,在我们就新的结构作出决定前,对现有机制的功能进行一次严肃审查是恰当的。

但只进行审计是不够的。本组织的结构必须是这样的,以致财政和行政的管理无章能够加以防止。例如,一线管理人员必须对其掌握的预算负责。荷兰代表团在最近几年提出了若干旨在改善联合国方案管理的建议,这些建议随后被大会所采纳。

此外,我提倡更高的成本意识,这不仅仅在联合国职员当中,而尤其应当在会员国之间。要求秘书长开展新的活动、召集更多的会议或就各种问题编写报告是较为容易的事。但我们每一次必须问我们自己,这些争用紧张的财政和人力资源的要求是否能够满足真正需求。

虽然联合国的资源有限,但真正的优先项目必须加以满足。在此方面,大会本届会议将面临一个特别困难的任务。它必须决定在1994和1995年正常预算内哪些活动将得到优先处理。随着新的优先项目的出现,一些活动将不得不削减乃至完全取消。我们必须量入为出。荷兰认为,最需要额外资源以加强联合国在人权领域的能力、改善秘书处计划和管理维持和平活动的的能力,并确保人道主义和紧急行动得到有效协调。

至此,我已经谈到了一些联合国若对它面临的新挑

战作出有效反应所必须加以满足的条件。可靠的财政基础、有效的管理以及在秘书处和实地和平行动范围内具备合格的工作人员,这些都是必须加以满足的物质需求。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实际的实施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安理会的决策应反映代表联合国会员国的统一政治意志,以便在上述物质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在必要时将其言辞转变为行动。然而过去经常发生的是,当此种行动既有必要也属正当时,尽管存在公开的意愿,但却屡次未能采取果断行动。

暂且不论它对和平行动本身所带来的有害后果,从长远看,它还能对整个联合国的声望和信誉造成难以补救的损失。请让我确这一点:我不是在提倡动辄诉诸军事行动。但是如果安全理事会划定一条界线并声明如果跨越这一界线,将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它必须对执行这一保证有所准备。如果这一行动未能兑现,其授权则不足以满足局势的要求。另一方面,如果有足够授权但安理会缺乏执行它的意志,那么其表现出的决心则不过是一场空洞的威胁。无论哪种情况,本组织的信誉都受到一次严重打击。如果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我们则面临使后冷战时期的新的和果断的联合国变为一个纸老虎的危险,因为它作出其本身无法或不愿意付诸实施的决定。决不能允许这种局势出现。

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决策果断的联合国以及各会员国的坚定承诺。联合国需要各会员国缴纳其会费、为该组织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并表现出执行它们所共同达成的各项决定的政治意愿。各会员国则需要一个能够有效地运转并执行这些任务,对委以它的资源能够负有责任的联合国。荷兰王国的愿望是,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将使我们更接近于实现这些目标。

克拉夫属卡先生(白俄罗斯)(以俄语发言):我谨

向圭亚那代表被一致选为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主席这一要职表示衷心的祝贺。这是对他本人和他的国家的极大尊重。我不能不注意到友好、兄弟的保加利亚人民的代表斯托扬·加内夫先生在这一职位上所作出的值得给予最高赞赏的大量艰苦和复杂的工作。

我们对今年成为联合国成员的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摩纳哥、安道尔和厄立特里亚表示欢迎和祝贺。

二十世纪末叶将毫无疑问地以国际关系中发生巨变的时代载入史册。随着两个超级大国和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剧烈对峙变为历史,我们亲眼目睹了冷战这一巨大的地壳板块。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生存空间已经被打开,它将是什么样子呢?

上个世纪的结束充满了反映在一种超现实求索当中的可怕的不祥之兆,但不幸的是,这些不祥之兆已被证实。艰难的二十世纪则成为对人类灵魂和人类社会来讲充满混乱的世纪以及曾多次将人类文明推向毁灭边缘的充满极端敌对紧张情绪的世界。

今天,人们的感情和期望是不同的。似乎在本世纪结束时,使国际社会新生活变得和谐的基础正在奠定之中。

但一种新的世纪秩序的建立不会象人们想象的那样毫无痛苦。权力均衡的变化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力经常以难以预料的方式突变为剧烈冲突和矛盾的混乱局面。世界强国、国家之间的联盟以及新生国家都在一个崭新的世界中寻找其自身的特征和重新考虑其作用。

给我们所有人以启发的组织和把握方向的能力或一个价值观、指导原则和思想体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总能被人们所察觉到的。

在这种局势中,产生了关于联合国潜在作用的新的

概念。我认为,联合国的这种组织作用比原来在战后几十年中赋予它的作用更崇高,更意义重大和更现实,因为原来的作用在超级大国对峙的情况下实际上是行不通的。白俄罗斯共和国所最积极提倡的正是联合国在一个新的世界上的这种作用。

正是在这个时刻,《联合国宪章》和本组织自己作为一个使各国行动一致和协调的重新的潜力正得到实现。正如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所强调的那样,联合国正真正成为不可取代的。

毫无疑问,联合国的新作用要求在本组织中达到新水平的效率,在其主要机构,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中尤其如此。白俄罗斯共和国支持旨在帮助使本组织适应基本上是崭新的现实和使其主要机构的程序更为民主的改革。但是,在向前移动的时候,一定不能失去所立足的依据。改革、责任和未来是那些我们认为我们应该不断集中注意的衡量标准。

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安全理事会就象一个在其中可以发现永恒内有魔力的水晶球那样,正成为注意的中心。很自然,必须采取一种特别负责的方式来改革安理会,包括增加其席位。我们考虑到在这些新的条件下,这个最重要的联合国机构不能再一成不变,还象它与半个世纪以前被设计和创立的那样,因而支持仔细地寻求就所有有关其改革的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特别是在今天,当安理会的工作已大大强化了的时候,对其进行的改变不应妨碍其努力的效率。我们认为,这些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安理会所有15个理事国之间的协调良好的活动,取决于它们对本组织《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遵守,并取决于它们通过实际行动向整个国际社会所证明的高度认真和负责的态度。

正如各位代表所知,白俄罗斯共和国是1994年至

1995年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候选国家之一。今天,在联合国创建50周年纪念的前夕,回顾这一点是适当的:在于1945年创立世界议会的时候,白俄罗斯是联合国的一个创始会员国,是头一批签署其《宪章》的国家之一。

在这里可以适当地回顾,我们通过在1974年至1975年在安全理事会进行的工作获得了一定的经验。同样真实的是,我们参加这个重要机构的次数与我们在本区域集团的朋友和同事们相比是最少的,但我们希望这种不公正现象将在将要举行的选举中得到纠正。

由于导致创建以明斯克作为其协调机构的东道城市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新历史条件,我们重新看待我们的作用和我们参加国际社会生活的各种可能性。独联体和一些友好国家对白俄罗斯作为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候选国家所给予的联合支持也证明了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提出由白俄罗斯共和国作为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候选国家并不仅仅是一个自发的政治姿态,也不是追求形式上的特权。由于历史条件,在这个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极其困难的时刻,白俄罗斯的经验 and 潜力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可以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让我们看一看那些得到广泛承认,即使在当前的这场辩论中也得到证明的并对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变得非常重要的方面中的这种经验和潜力。

我首先谈一谈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问题。正如各位代表所知,白俄罗斯是从前苏联继承了战略性核潜力的四个国家之一。在我们的情况中,这是一个位于欧洲大陆心藏的重要的机动战略导弹现代武器库。它直接影响着全球安全、核均势以及核不扩散。然而,白俄罗斯放弃了一个核国家的特权——即克林顿总统在这里所提到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并已选择了非核地位。

我们在作出了适当的承诺之后,正在实践中履行它

们。1992年我们率先从我国领土上销除了战术核武器;事实上,这项工作是提前完成的。今年2月,白俄罗斯议会几乎是一致地批准了《裁减战略武器条约》(第一期核武会谈)以及该条约的《里斯本议定书》,并决定作为无核国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今年7月,我国在华盛顿、莫斯科和伦敦存放了加入文书。

我想强调,自1992年5月以来,即,自签署了《里斯本议定书》以来,我们从没有给任何人任何理由来怀疑我们的行动的诚实、逻辑和一致性。在所有从苏联继承了核武器的国家中,白俄罗斯是第一个,而且仍然是唯一的在实践中放弃了核武器的国家。此外,我国是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或保留的情况下这样做的。因此,国际社会历史上首次有一个主权国家自愿放弃了拥有并发展核潜力的真正机会。这确实是白俄罗斯为全球安全和不扩散核武器所作的巨大贡献。我想强调,我们是言行如一。

我们于1990年在这个崇高的讲台上提出了建立一个从波罗的海沿伸到黑海的无核地带的意见,自那时以来,我们一直在尽我们的最大努力将我国领土转变为这个地带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在适当时间内,我们的邻国将支持并发展我们的意见。

从前苏联的领土上非法出口可以落到不负责的人的手中的核原料、技术和设备的威胁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关注。白俄罗斯对这一危险作出反应,成为本区域第一个同美国签署一项大规模协定,以便建立一套严格的出口管制制度的国家。执行这一协定的工作已经开始。

我国提出的其他一些倡议也同样是为联合国所熟悉的。在白俄罗斯作出了多年的努力之后,已一致同意要建立一个由可能防止各国以新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补充其武库的国际机构。在本届大会期间我们打

算继续在这方面进行积极的工作。

鉴于在这些问题上的权威性立场,白俄罗斯代表独立国家联合体各国并根据其指示,打算在本届大会期间提出一项独立国家联合体关于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联合宣言。

现在我要谈论裁减常规武器的问题。我国现在没有也从来没有制造军用坦克。然而,我们现在拥有的人均坦克数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多——这是我们从前苏联得到的又一部分难以处理的遗产。当我们决定加入欧洲常规部队条约时,我们十分明了白俄罗斯不得不销毁的坦克数要多于美国1.7倍,多于联合国10倍并多于法国50倍。该项条约没有考虑到这种不符比例的负担,因为前苏联各共和国没有机会参与条约的制订工作。

然而,处于危机关头的是许多欧洲国家以为之工作了20多年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国际协议的命运,因此为了不至于破坏所有这些工作而使欧洲陷入多年,我们承担了这种过于沉重的负担而由我们目前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现在白俄罗斯正在销毁前苏联留下的军事坦克地区的武器,从而为加强地区和国际安全作出巨大的贡献。我们在进行这项工作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是因为存在着目前过渡时期的许多问题。我要指出的是,这经常引起我国人民缺乏谅解:在一场能源危机之中,我们缺乏能源来进行庄稼播种的工作,但我们却要销毁坦克。

武器是不道德的,就象战争之摩洛哥神是不道德的一样。但是裁军的过程却远非是田园诗般的美好:我们居然出乎意料之外的应了我们对世纪的流行的话——“先有枪炮才能有奶油”,因为销毁枪炮一点也没有增加奶油的供应量。

在裁减常规武器的过程中,白俄罗斯是以大家的利

益作为其行动指南,因此它有权指望其他国家给予回报以克服它的困难。

总的来说,从前苏联得到的是一种难以处理的遗产:一种最高度军事化的经济以及规模最庞大的军事部队。只需要说一句话就可以证明这一点:1992年年初,我国领土上每1 000个平民所有的士兵和军官的人数是苏联以前平均数的三倍之多。

我国的议会和政府在为使白俄罗斯保持中立来进行真诚努力的过程中已制订了一项旨在使国民经济非军事化的政策。其中包括在5年内裁减50%的军队,并发展和采取一种防御性的军事原则。

白俄罗斯共和国已经在很多次战争的恐怖之中生活了几个世纪,并在战火之中丧失了数百万的公民,因此它愿意尽力确保军事对立的战火永远不点燃它的领土。

下面我要谈谈种族冲突问题。

激烈的血腥的种族、宗教和社区间冲突已成为新世界的一种危机的特征。这些冲突根深蒂固的而往往又是荒谬的根源对整个国际社会造成了特别难以对付的挑战,因为简单的解决办法对它们不起作用。在白俄罗斯,深刻的社会变革是在我国社会内各种种族、文化和宗教群体间所特有的相互酝酿的背景下进行的。在这一艰苦的过渡时期,白俄罗斯的土地没有受到一滴血的污染,我们将继续作出最大的努力,使位于欧洲大陆正中的白俄罗斯能够继续在政治、种族和宗教平衡方面作出榜样。

白俄罗斯具有独特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保障了稳定和不可逆转的民主改革,同时我们要真诚地向安全理事会提供我国不同种族共处的经验以及已成为我国特征的具有几百年历史的民族、文化和宗教容忍的传统。

我确信这种容忍可以成为解决任何冲突的重要关键。有了国际努力,我们就能取得成功。正是容忍这个词的最佳意义才使得最近的一次握手成为可能,而这次握手最终打开了通向曾经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途径:中东问题的解决。正是容忍将确定南非现在出现的过程能够得到成功,而正是由于缺乏容忍使得波斯尼亚的危机迟迟不得解决。

不稳定、种族和宗教冲突、种族和地区分离主义以及内部政治争斗:它们在苏联后的地区内都已经达到了悲剧性的程度。在若干情况下,它们已发展成为当地的军事冲突,甚至是战斗。白俄罗斯的内部稳定以及它的中心地位——作为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调机构的东道国——使白俄罗斯有可能成为这些冲突的和解调和者。

例如,我们真诚希望协助解决纳戈尔尼—卡拉巴赫问题。白俄罗斯仍然愿意协助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的主持下在与会国确定的日期于我国首都明斯克举行纳戈尔尼—卡拉巴赫问题国际会议。

我们认为白俄罗斯宣布的中立立场是一种国际有利条件。这一宪法目标使我们能够采取一种更为广泛而不偏不倚的办法来确定我国对各种问题的立场。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充分考虑到当今世界的各种现实以及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们努力实施我们的政策是要为建立一个繁荣中立的白俄罗斯奠定基础。具体地说,我们是在朝着制订和实施各项民主原则而前进。

白俄罗斯议会正处于审议我国新宪法的最终阶段,这一宪法将巩固我国民主化不可逆转的进程。我们正在建造一种新的政治结构:新的政党、民族、社会和政治运动,以及数以百计的公民组织已经正式注册并已开始它们的政治活动。

这些组织之一是保护人权同盟。白俄罗斯正在发展的人权状况是符合国际标准的。早在1991年,我们批

准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任择议定书,并根据盟约第41条承认了人权委员会的职能。

白俄罗斯赞扬今年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权会议的结果。会议特别重申了各国完全有效地保证所有人权与基本自由,而不对属于少数民族的任何人实行政视的义务。我们对这一条款极为重视。

白俄罗斯对在其领土内生活的少数民族创造了,并且仍在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使其能够充分享受人权。但是同时,我们对于居住在我国国土以外的白俄罗斯人的待遇远远不是无动于衷的,并且在今后将继续密切注意居住在世界不同国家的两百万白俄罗斯裔的居民。

经济改革在我们共和国取得了成就。逐步地走向市场经济增加了经济的开放程度,并且限制了国家在一些生活领域里的垄断。现在已经为开创私营部门采取了具体步骤。关于私有土地的财产法,这一方面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已经从9月1日起生效。这些法律的通过,诸如关于财产、企业活动、外国投资等法律,已经为进一步发展市场关系创造了基础。现在,白俄罗斯正将进入私有化的更广泛的阶段。

白俄罗斯共和国与本区域其他国家一样,极为重视发展和加强经济领域的多边合作。我们认为,对于中欧与东欧一些国家的歧视与限制的形式应当随着冷战一起成为过去的事情。在这方面的任何拖延都将不符合世界的政治与经济关系。

白俄罗斯正力图消除贸易方面的壁垒和限制,并且作出决定,就其加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总协定)开始谈判。我们并希望,乌拉圭回合很快就将圆满成功。

在独立国协内新的经济活动水平上的一体化对于我们具有特别的紧迫性。白俄罗斯是在独立国协基础上建立经济联盟,并且为此缔结一项适当的协定的主

要倡议国之一。我很高兴地提出,最近在舒什克维奇先生为主席的领导下,在莫斯科举行的独立国协国家首脑理事会会议上签署了一项关于建立这样一个经济联盟的协定。

这对于独立国协的经济稳定,对于逐渐克服这一过渡时期最严重的问题开辟了有利的前景。我深信,在莫斯科达成的协定将标志着走向全新的关系,即市场关系的转变,而且将不可避免地在这一基础上导致建立东欧的联盟,这一地理政治和经济小组的市场形式将逐渐地,但同时始终不渝地和坚定不移地统一到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经济结构之中。

这些新的前景鼓励了我们,也是由于因为我希望它们将帮助白俄罗斯在不久的将来加强其真正的支付能力,并在很大程度上清偿我们对联合国的财政义务的问题。

我们完全了解联合国组织的困难状况的严重性。正因为此,尽管我们面临着极为困难的经济和财政局面,白俄罗斯政府最近向联合国的预算交付了达350万美元的会费,而且实际上完全付清了所欠的会费。我要向联合国会员国保证,我们将继续在我们非常有限的资源范围内尽力而为。但是联合国本身通过大会的主要机关必须采取步骤使白俄罗斯的财政义务严格地符合我们实际的支付能力。尤其是,新的现实要求毫不拖延地作出决定,将我国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费用分摊表中从B组改列到C组中去。

我在发言开始时提到了白俄罗斯对联合国活动的前途抱有巨大的希望。但是,对于我们,联合国的援助在一个特别的方面具有极端的重要性,这就是环境,以及我们的“永远不会痊愈的创伤”——切尔诺贝利,最为严重的核灾害。

除了癌症的增加,特别是在儿童中增加,我们最近

极为关注的是我国人民中的社会和心理压力。出生率大幅度下降,而由心理状态造成的疾病迅速地增加。人们由于担心其健康及其儿童的健康而忧虑不已。这也影响到共和国过渡到新的社会和经济现实的步伐。我们呼吁联合国与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密切合作继续努力,进一步研究和克服切尔诺贝利灾害造成的后果。我们希望,在改革联合国系统及其秘书处的过程中,将拟订出必要的体制性和方案性的机制,以便进一步开展有关切尔诺贝利的活动,以维护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同时考虑到切尔诺贝利悲剧教训的重大意义和独特性。

新的联合国关于切尔诺贝利问题协调员扬·埃利亚松先生所开展的活动,其工作的开端受到了我们极大的赞赏,使我们希望联合国的潜力能够积极也利用,以便取得具体的实际成果。

在切尔诺贝利后阶段,我们需要精神和心理方面的支持,有时候只需要同情。这一方面,我要回顾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话,他生在白俄罗斯。他曾经宣布人际关系的爱好与高尚能够拯救世界。在这之上我要加上同情心,因为它们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因为美丽的总是崇高的,而同情心与高尚总是美丽的。

白俄罗斯经历了切尔诺贝利之后的恶梦,几个世纪以来又一直遭受掠夺、侵略和战争,贫困与艰苦的恶梦,比任何国家更能理解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痛苦与困难。世界许多地方的贫困、疾病、婴孩死亡率使有良好愿望的人们不能无动于衷。而不注意这些实际上是不道德的。我们深信,新的世界秩序将要求世界财富的更公平的分配,而其特点应当是援助那些几十年来不公正的接受着贫困、萧条与可以预见的落后命运中的人,他们不得不满足于接受由其生产,但是经过

重新分配而对其不利从而只得到大部分财产剩余的很小一部分。

我国作为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创始国,正努力以公平地反映出所有国家集团的生态和经济利益的方式为其工作作出贡献。我们支持拟订一项关于沙漠化的国际公约的努力;寻求解决发展中小岛屿国家的问题的办法;并且为发展中国家寻求新的更多的资源。

白俄罗斯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后的现实情况下认识到生态问题对寻找一项解决方法的重要性,一直积极支持执行历史上第一次地球问题首脑会议的决定和建议。白俄罗斯共和国的议会已经批准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现在正在审查加入《气候变化公约》的问题。我们支持在国际合作范围内优先审议生态问题,白俄罗斯共和国支持在不久的将来把持久发展委员会改变为联合国生态安全理事会。我们准备协助制定该理事会的结构和任务。

联合国正背着沉重的包袱从一个旧时代向新时代过渡。它的某些部分已经过时,只会使研究历史的人感兴趣;另一些部分包含了联合国在我所说的迅速演变的世界可以发挥的未来新作用的成分——例如在纳米比亚和柬埔寨的积极和面向未来的大规模维持和平行动的经验。我们正处于第三个千期年的前夕,我们很难想象未来世界总的景象的所有细节。但是,眼前的前景是最重要的,而这些前景是清晰可见的。从停火组织者的作用到和平保障者的作用,从和平保障者的作用到国际社会生活的共同组织者的作用,这是一个毫无疑问所有人都承认其政治意愿的英明和权威的仲裁者;这就是我们对联合国在下个世纪作用的想法。白俄罗斯为了迎接时代的挑战,准备同其他友好国家一道努力,如果大会愿意的话,包括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进行努力。

普斯先生(卢森堡)(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向大

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主席的当选表示衷心的祝贺,由于他的杰出品质,他担任这一职务得到了普遍的支持;他的当选也是对他的国家圭亚那的赞扬。

我们的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也值得我们衷心地感谢和赞赏,他为执行本组织的决定和应用《宪章》的原则作出了持续和果断的努力。

随着6个新国家——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共和国、厄立特里亚、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摩纳哥和安道尔的加入,联合国本来就非常广阔的普遍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我对此表示欢迎。

比利时外长维利·克拉斯先生昨天表示了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的观点。因此,我在本次发言中将集中谈谈我国政府特别关心的几件事。

三年前,我们在本讲台上欢迎了东西方冲突及其衍生的核毁灭威胁的结束。民主和对法律的尊重在全世界的进展极其令人鼓舞。但是,鉴于过去几年的事态发展,看来我们的热情应当有所减少。

主导旧秩序的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发生了变化,使得民族主义和区域主义得以发展。在一些情况下,这导致在邻国间竞争、种族紧张和宗教狂热之后的整个区域的动荡不定。

民族主义本身当然并不是一种罪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在多年的压迫之后最终能够表现出来的自豪和自信感的合乎逻辑的表现,在受压迫的年头里言论自由受到压制。

但是,人民这种重新获得的自豪和合理表示一旦转变为对公然敌视任何不同的事物之后,民族主义内部就含有严重危险的种子。

在许多地方可以看到极端民族主义,不管是在前苏联的领土内还是前南斯拉夫境内,它在后者境内的表现是最不能令人容忍的。它导致暴力的爆发、武装

侵略、恐怖主义行为和平民人口遭受的无法描述的痛苦。

世界所有区域都在发生种族冲突。在西欧本身,它的表现就是种族主义和恐外事件的重新上升。

极端民族主义是对法律的主导地位和对尊重人权的挑战,威胁了国际秩序。

必须采用明确和协调的战略来迎接这一挑战。

首先应当重新进行有关容忍的教育;第二,必须确保对少数民族的法律保护。

欧洲理事会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在这一领域中起草的原则和规则也许可以提供某些解决办法。欧洲理事会首脑会议下周将拟订新的文书。欧洲稳定计划是同一办法中的一部分。

第三——这也是应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我们必须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不遗余力地加强民主化,促进对人权的保护。

联合国正是在这些原则——其重点是人民的言论自由和发展民主体制——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冲突的方法和协定,而要求联合国解决的冲突的数量日益增加。

卢森堡政府对以色列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达成的彼此承认的协议和有关被占领土自治的协议深感满意。

我们谨向达成协定的人们表示敬意,特别是拉宾总理、佩雷斯外交部长和阿拉法特主席。他们给世界上上了一堂勇气、远见和政治现实主义的课。

我们所目睹的事态发展具有同柏林墙倒塌一样的历史意义。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东的现实;他们开始了一个和解进程,以便结束一个具有爆炸性的、无法维持和不公正的局面。

在一个被战争、暴力仇恨蹂躏了40多年的区域现在正出现这样一个比较和平和民主未来的希望。这种

已经创造的动力现在还很脆弱,必须毫不拖延地予以加强。

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可能由以色列和它的邻国——黎巴嫩、约旦和叙利亚缔结和平协定。卢森堡政府鼓励有关的领导人克服最后的障碍,打开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道路。

随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必须在区域和国际社会的支援下,本着诚意一起行动,成功地执行有关被占领地区自治的协定,这是全面解决的第一步。作为第一个资金捐赠国,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准备扩大合作,帮助一个必须被帮助的人口走出贫困,建立一个更加体面和繁荣的未来。联合国政府将充分参加这一努力。

由于联合国,纳米比亚和尼加拉瓜三年前恢复了和平。

今天,在柬埔寨,由联合国领导的努力已使这一拥有古老文化并遭受几十年血腥镇压和外国占领的人民,能够大规模地参加自由和公开选举。通过巩固法治和全国和解,这一国家将能够把自己重新建立起来。

在海地,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间密切合作的坚定政策,已导致达成一项协定,为恢复民主作了规定。

在萨尔瓦多,联合国的援助在结束内乱和重新开始建立一个平民的社会和全国和解进程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有萨尔瓦多人将都能参加明年举行的选举。

但是,在索马里,联合国的干预显示了在没有政治协定和停火的情况下,武装干预在部落内战中的限度。然而,在摩加迪沙遇到的困难不应该使我们忘记联合国为克服饥荒作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

南非正朝着最终解除种族隔离作出进一步果断进展。我欢迎达成设立一个过渡性机构的协定,来起草

一份临时宪法和筹备1994年4月的自由选举。只有以所有各方共同决心和密切合作,才能制止继续屠杀和危害和解进程的残酷暴力。

中美洲和其他国家也在恢复民主和实现全国和解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这些成就无论如何不完善却令人鼓舞,并显示了我们的组织在维护和平和巩固民主政权方面能起的作用。

前南斯拉夫境内的局势仍然令人极其不安。每天都在电视上看到“种族清洗”所带来的野蛮现象,和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血腥肢解。这一国家曾经是各种族和宗教共存的榜样。

仍待最后定稿的波斯尼亚三方之间的协定,应承认是复杂的,而且远远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它能带来结束恐怖和暴力的前景,它为走出危机提供了一种全面的安排。该协定的成功还远远没有保证,但成功的先决条件是三方面都真正希望达成协定,并执行遵从所签署的文件。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必要时在西欧联盟的援助下,准备同联合国、北大西洋条约组织(北约)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合作,为执行该协定作出贡献。在安全理事会与前南斯拉夫问题的各项协议都得到落实,少数民族问题找到了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后,制裁可以取消。

总而言之,我们组织的维持和平活动已达到空前的程度。将近80 000名军职和文职蓝盔人员正在外地执行空前数量的人道主义特派团和维持和平行动。我要向所有为和平事业服务,特别是那些已在这些行动中牺牲的人们致敬。我们有责任保证加强人员的安全。

卢森堡本身也是通过一项由当时各大国保障的国际条约而产生的现代国家,对安全和维持和平的需要特别敏感。因此,卢森堡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积极贡献。派遣军事人员,并作出适当的财政贡献。今后,我

国政府打算继续这种合作。

卢森堡还积极支持扩大联合国在预防性外交领域中的活动。这些努力必须扩大。派调查团,利用快速警报系统,建立一个迅速部署小组和加强区域性组织的作用等措施。在防止冲突方面都可以很有帮助。冲突一旦爆发,恢复和平需要的干预代价将高得多。

联合国和各区域组织之间正在发展新的合作,这些区域组织将在他们的层次越来越多地被要求进行维持和平的职能,或支助和补充联合国在集体安全领域中的活动。由我国目前担任主席的西欧联盟,目前正在界定它在维持和平行动中的作用。北约和欧安会也在这样作。

维持和平与促进民主和法治,同保护人权是相辅相成的。

多年来,我们组织在发展和逐步编撰人权方面是成功的。但是,这还不够;我们还必须确保这些权利得到更好的尊重。涉及捍卫人权的各组织的年度报告表明,我们离实现这一目标还很远。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维也纳人权会议可以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人权的普遍性得到了明确的确认。提出了更加广泛地了解人权,促进人权和保护人权的具体建议。现在应由本大会批准这些建议,包括设立一个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在尊重人权和促进民主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分割的连系。在联合国系统内,这种联系的具体形式表现为联合国在为选举进程提供技术援助和国际监督方面的活动与日俱增。我支持我们的秘书长提出的建议,扩大这些支助活动,包括建立新闻自由,政治党派和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

在这方面,我欢迎叶利钦总统决定组织自由选举,以便确保俄罗斯所有国家机构的民主合法性。

联合国还必须增加它在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中的活动。这也需要对其结构和工作方式进行持续和勇敢的改革。

有的民族处于赤贫和饥荒之中,当他们在实现更大的公正和平等方面没有任何取得进展的希望时,我们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合作和贸易是必须奉行的一项完整政策的两个核心。在几十几年中,我国政府将指定用于发展与合作的援助增加了一倍。我也支持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范围内迅速缔结一项公平的协定。这样一项协定将在世界以及对贸易和经济关系以新的推动力。

在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之后,必须确定新的持续发展委员会,以确保就在该次会议上作出的承诺采取后续行动。

在过去四十年中,世界人口增加了一倍。据估计,在今后三十年中世界人口将再增加一倍。国际社会必须对如此迅速增长的人口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如难民、城镇人口密集化、在食品、住房、卫生保健方面施加巨大压力等问题进行彻底分析。因此,1994年于开罗召开的人口与发展会议是非常重要的。

在许多国家的经济处于困难的调整过程而其它一些国家的经济正在进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微妙过渡之时,社会问题越来越重要,这并不奇怪。此外,最近出版的报告都证明,在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贫困人口间的差距有了扩大,令人担忧。

将于1995年召开的联合国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如果得到充分的筹备,将使国际社会有机会制定一项与贫困作斗争并确保更好的分配财富的责任。

一年多以前,秘书长发表题为“和平纲领”的报告。该报告旨在加强本组织在预防与外交及维护和恢复和平方面的能力。其中的某些建议已开始实施,而其它

的建议仍未得到实施。我们希望,目前对该纲领的审查将产生能满足本组织需要的具体成果。

安全理事会的改革是一个涉及到战后国际合作核心内容的棘手问题。安理会已运作了五十年,现在应该对它的改革问题进行坦率、深入的讨论。1995年本组织五十周年纪念将为这项工作提供一个良好的机会。

联合国面临的第二个危机是长期的预算赤字。迄今的所有发言都强调指出了这一点。说的严重一点,联合国现在正处于破产的边缘。本组织的年度预算只相当于一个中型城市的年度预算,因此,这使人更感惊奇。

各会员国在法律上有义务及时缴付其全部会费。联合国的可信度和行动能力取决于这一点。

最后,我要谈一下一个旧的欧洲。

在建设欧洲联盟时,欧洲共同体成员国为整个大陆实现一个真正统一的欧洲抓住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过去,欧洲国家经常相互发动战争。

在不否认目前困难的同时,我认为,欧洲共同体正在进行的一体化进程将激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发起区域一体化的倡议。

欧洲统一的提出和实施是基于下列仍然充分有效的原则:即和平与致对的各民族间的和解,广泛的政治、经济、商业和文化合作以及发展基于多元化民族、市场经济和团结的社会模式。这样的模式必须得到经常的调整,即使我们永远不能使它成为完美的模式,它也将保持公正和社会凝聚力。

正是在这些共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欧洲各国人民才能在其历史上首次共同创建其未来。同样,我认为,在世界以及通过协调的国际行动我们将更加能够克服和平的障碍,创建一个更加民主、更加宽容、更加公

正、更具社会性、总之更加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的世界秩序。

韩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祝贺圭亚那的英萨纳利大使当选为大会第四十八次会议主席。我还要感谢大会上届会议主席保加利亚的斯托扬·加内夫大使阁下所作的出色工作。

我还要对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献身于联合国的事业以及处于重要关头的联合国改革表示致意。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对新会员国-安道尔、捷克共和国、厄立特里亚、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摩纳哥和斯洛伐克共和国-表示最热烈的欢迎。我国代表团祝愿他们取得成功,并盼望着与他们在各个领域进行密切合作。

我们生活在一个历史性过渡时期。这一点已为上届会议以来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所证实。与旧的世界秩序根本不同的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我们正目睹着走向和平、合作和相互依存的趋势,而不是走向冲突、对抗和意识形态偏执的趋势。这一点最强有力的证明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本月在华盛顿签署的和平协议。

今天我们正处于对联合国的创始者来说只是一种设想的国际环境中。我想引用一下1947年时的大会主席,巴西的杰出外交家奥斯瓦尔多·阿朗阿先生的一段话。他说:

“今天,所有武力的观念都是过时和消极的。以政治力量为基础的旧秩序企图垂死挣扎,但是,通过武力取得优势的作法已没有任何市场。联合国代表以和平协议、谅解、自由讨论……以及各国人民共同和平等责任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大会第二届会议第128次全体会议正式记

录)

在讲过这些话的45年之后,我们终于处于一个时代的结束以及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这可能是我们的第二次或许最后一次机会,来完成联合国在成立时所阐明的使命。

确切地讲,冷战的结束并非意味着所有问题的结束。世界正为持续甚至日益恶化的种族和宗教冲突而担忧。我们面临着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情况。环境保护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又一重大挑战。发展绝不是理所当然之事。这些都是需要国际社会全体成员的集体努力,尤其是联合国的努力的重大问题。

我们已进入多样化和不确定性的时代,但我们不应被这种新的现实所吓倒。我们也许对之不习惯,但我们不应害怕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之中。各国要实现的目标及实现的方式各有不同。这些不同的目标形成可能的冲突根源,但也应形成各国间相辅相成与合作的基础。

一些人指出,两极化正被多极化所取代。然而,“多元”而不是“多极”或许是描述正在出现的世界秩序的更准确的词语。一个多极的世界决定了基于冲突和力量平衡的地缘政治。而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则承认多样性并鼓励合作。因此,世界具有变得比历史上以往更为民主和更和谐的潜力。

冷战之后最值得注意的变化之一,就是联合国尤其在和平与安全领域中得到加强。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去年提交的《和平纲领》报告,为加强联合国在该领域中的作用提供了坚实基础。

特别鉴于冲突一旦爆发所造成的人力和物质损失,预防性外交极为重要。我国代表团将继续参加把诸如“预防性外交”和“冲突后建设和平”等倡议变为有意义的现实的努力。

正如波斯尼亚和索马里继续出现的悲剧所表明的那样,由种族和宗教分歧、贫穷和内部混乱所助长的冲突,正成为对国际安全的新的主要威胁。为了对声浪日高的要求作出反应,17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正在世界不同地区积极进行。

然而,传统的维持和平不再是对目前冲突的充分反应。我们认为,这些活动的范围正在扩大,从监督停火到建立国家。此外,维持和平人员的及时部署,是早期缓和冲突的必要之举。

为此,我们认为,建议设立的联合国备用部队的机制是加强本组织在应付和平所面临的新挑战方面的作用的适当方法。备用部队的存在将使联合国能够对冲突作出迅速有效的反应。

我借此机会重申我国政府对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第二期联索行动)的支持。我们于今年6月派遣了一个工程营,我们敦促索马里有关各派系与联合国充分合作。鉴于柬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力机构所确立的成功先例,我相信第二期联索行动也将完成其维持和平的任务。

然而,引起人们严重关切的是,联合国在索马里的伤亡数字正迅速增加。需要作出有效的安排,以加强那些参与联合国在那里和其他各地方的维持和平行动的人员的安全。

在和平与安全领域中,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核武器以及生化武器——的扩散,是另一重要任务。

大韩民国坚决支持通过延长《核不扩散条约》而在1995年之后制止核武器扩散的努力。我们还支持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措施,使之成为确保《不扩散条约》效力的中心机制。

同时,我们坚持《不扩散条约》的精神和目标,敦促现有核大国不仅加速削减其核武库的努力,而且积极

参加关于全面核禁试条约的努力。这将鼓励无核国家坚持并同意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条约》制度。我国代表团欢迎核武器国家关于继续暂时停止核试验的承诺。

关于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今年1月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结是向前迈出的一个巨大的步骤。我们敦促尚未加入该公约的国家尽早加入。该公约与生物武器公约一道,将成为防止生化武器扩散的一项主要文书。

随着的冷战的结束,裁军已进入确实可能的境界。在过去几年中,随着有关削减核武器和减少常规力量的协议的签定,裁军获得了势头。我们必须保持这种势头一直不衰。鉴于这种事态发展,1992年10月秘书长关于“冷战后时期军备管制和裁军的新层面”的报告,为裁军提供了及时和有益的指导方针。

同时,我们应注意到,多边裁军机制正在作出的重新估价。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尤为重要。我国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组成应适当扩大,以反映已经变化的国际环境。

此外,随着70多个会员国的参加而发起的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应尽快得到普遍执行。

在讨论裁军问题的同时,我需要提请各位注意朝鲜半岛。尽管出现了世界范围的和平与合作的趋势,但朝鲜仍然存在着紧张局势。

我国政府认为,应争取在冷战后的和解与合作的国际秩序范畴内解决两个朝鲜之间的问题。这意味着北南朝鲜都积极参加区域和全球秩序。

我们尤为关注北朝鲜的核计划。北朝鲜应进行合作,通过履行其根据《不扩散条约》所承担的不扩散义务而消除围绕它的任何猜疑。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825(1993)号决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必须遵守它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的保

障协议。同时,我们敦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我们合作,执行1991年两个朝鲜之间的《朝鲜半岛非核化联合宣言》。

我国代表团对北朝鲜核动力反应堆的安全也深为关切,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及有关国家应该特别注意同北朝鲜核计划有关的安全问题以及不扩散问题。

有好几个属于非军事性质的紧迫问题,需要用全球办法予以解决。其中有发展和贸易、环境和人权。

冷战后的国际环境既要求又使我们能够更为强调经济和社会发展。现在我们将和平红利用于发展努力。鉴于当今世界高度的相互依赖性,任何国家都不能免于其他国家经济困难的后果。贫穷、人口问题和环境退化已经成为对人类幸福的共同威胁。这些非军事危机是各国现在应以紧迫性和集体努力予以解决的问题。

联合国在这一领域的作用应该得到加强。我欢迎最近关于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改革和振兴联合国系统的倡议。这一系统的结构应该合理化,以有利于有效运用有限的资源。同时,我认为必须大量增加发展资源,以支持发展合作。鼓励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加强其努力。

为了实现一个更为繁荣的世界,我们需要加强全球自由贸易体制。《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关贸协定)的体制是在联合国创建后不久建立的。所依据的哲学是清楚的:和平与安全只有在经济繁荣的支持下才能得到最好的保障。在冷战期间,这一全球自由贸易体制为在其范围内的国家带来了财富和繁荣,超越了早先的期望。既然冷战已经结束,全世界能更充分地受益于它。

我们选择是明确的。我们必须通过确保乌拉圭回

合的圆满成功来加强自由贸易体系。

经济发展同环境问题密切相关。正是在去年的里约首脑会议上全世界才敏锐地认识到这一危急问题。首脑会议着重强调了建立全球伙伴关系,以便在走向21世纪之时实现有益于环境的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在我们处理环境问题时,重要的是要在北南之间保持平衡。前者强调环境保护的首要性,而后者强调发展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是寻求这一平衡并对实施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的成果进行协调的一个十分合适的讲坛。

作为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大韩民国准备发挥作用对全球行动作出贡献。我们希望帮助弥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我们现在正处于加入《气候变化纲要公约》和其它环境协议的进程之中。

人权问题在国际一级正在受到日益增长的注意。这可能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因为正在出现的多元化国际社会有利于促进全世界的民主。6月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权大会上,我有幸向大会报告,在韩国人权终于发展到完善阶段。我也保证我们坚决支持促进人权的国际运动。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是大会最重大的成果。我们必须采取必要的后续措施。五年以后我们将纪念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周年。我希望我们这一代人将能够满足制定这一《宣言》的人的期望。

在我们适当重视人权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应关心难民和处于不利地位群体的问题。全球的武装冲突和自然灾害造成了对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保护必要性。大韩民国最近加入了有关难民地位的公约,这表明它对这一事业的承诺。

我对将于1995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世界

首脑会议给予特别重视。我希望将在这一大会上提出有效的行动纲领以对付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

在联合国面临新的机会和挑战时,它也需要进行改革,以便更好地对付这些机会和挑战。这的确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我们认为,由于联合国总的会员数目大大增加,有必要扩大安全理事会。问题是如何扩大安理会而不使其有效性受到影响。建立一个第三类别,长期任理事国,但是没有否决权,同时扩大非常任理事国数目,可能这是答案。

关于大会,通过将第四委员会和特别政治委员会合并简化委员会结构,无疑将会加强其效率。议程的合理化可能是有助于加强大会能力的另一个措施。

我国代表团也欢迎秘书长关于改革秘书处的各项措施,并对他的这一复杂任务给予支持。尤其是最近设立的主管检查与调查的助理秘书长的办公室,这是走向增加秘书处的责任性的一个初步步骤。

我关切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财政情况的报告。我们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即为了使本组织能够满足它在时间上的要求,所提供的资源应该与其政治意愿相符。我国代表团赞成在本届会议进行建设性的讨论,它们将探讨减轻联合国目前财政困难的方式和方法。

我认为,改革应建立在对于变化了的世界形势的恰当了解之上,它也应同联合国的宗旨及原则相一致。我希望这一进程将导致一个高效率、有成效的联合国,它能在1995年这一国际机构创立五十周年之时真正实现人类的期望。

鉴于联合国在大韩民国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我们将以特殊的奉献精神纪念这一时刻。将成立一个全国委员会,将同秘书处协调各种活动,特别强调将联合国的信息转达给韩国的下一代。

在大韩民国,新政府为外交政策重定方向。我国的新外交将重点放在普遍价值之上——和平、民主、自由、福利和人权。全球主义是新外交的核心。

在处理诸如国际和平与安全、裁军、根除贫困、保护环境和有效利用自然资源等全球性问题时,韩国在努力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韩国正是通过参加这些全球性事务争取在联合国旨在使世界成为更安全、更公正和更为繁荣的地方的各种活动中发挥其应起的作用。

大韩民国目前参加了联合国索马里行动(第二期联索行动)。它还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任期三年的成员。我们将积极设法加强我们对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系统的组织的贡献。

在这一点上,大韩民国希望有机会成为安全理事会的成员,从而更好地促进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希望在这些努力中得到国际社会的鼓励和支持。

民主化以及民族之间的和谐是新的世界秩序中的最重要的趋势。通过促成民主化和民族和谐,我们有机会使未来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和平与安全。我们的成败将取决于我们对新秩序性质的理解以及我们建立新秩序的能力。

实际上,这里也有危险。国际联盟失败了。在冷战时期,我们也经常遭受严重挫折。然而,我们正临近一个新的开端。我们需要向前看,因为未来在我们掌握之中。我们必须向自己证明,我们胜任这项任务。

麦金农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联合国是我们的组织,我们是它的管理人,我们必须顺应变化。我们负有重大责任,应当给后人留下一个比初建时更好的联合国。未来时代的历史学家将对这一巨大变革时期给予承认。

但在1993年,我们组织的目标是什么呢?当然,这

些目标不难一一列举,因为《宪章》序言已经为我们并由我们作出了规定,今天这些目标仍如1945年商定时一样有效。

第一个目标,当然就是和平,因为没有和平与安全,任何人类社会都不可能繁荣,其次是人类尊严,因为我们彼此之间如果不把他人当作个人来加以尊重,我们作为国家也不会相互尊重;接着是正义,因为除非国家间关系建立在法律基础上,否则强者便会始终凌辱弱小;还有就是社会和经济进步,因为如果我们的经济没有持续和可持续的发展,所有其他成就都无足轻重。

我相信,在这一清单中,我们现在必须增加维持清洁的和吸引人的环境这一项。我们痛苦地了解到,我们的地球同样享有权利。忽略这些权利,只会给我们自己招来灾祸。

这些就是我们放眼未来世界的基础。在新西兰,我们应当说,它们给所有人带来了机会。当将近50年前联合国诞生时,这些还都是一些遐想,但联合国的创始人当然并没有因此止步。他们处在世界事务的分水岭。他们刚刚经历了全球冲突的可怕现实,在这场冲突中,几百万人死于非命,他们决心竭尽全力,确保这种冲突不会再次发生。他们确实干得不错。他们不仅在本组织中,而且在整个一系列经济、财政、社会和人道主义体制中体现了他们的设想,他们为它提供的唯一力量是:尽管人们来自截然不同的国家,但他们决心使这一设想成为现实。

只有具有极大的耐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才能使这一梦想和决心经过1945年以来50年的岁月仍然具有生命力。进展是缓慢的,有时还会停顿下来。人们做了一些重大的事情,但联合国会员国往往只能达成最低限度的一致,这反映了联合国会员国之间的政治隔阂和限制。

然而,有四条理由使我相信,长期以来的灰色时代已经结束。

首先是冷战,也即一场全球冲突的阴影与威胁目前已经完结。联合国免除了这一压力,可以按照它的意愿采取行动,成为其全体会员国安全的最终保障者、世界和平的最后仲裁者。

第二,民主这一国家之间和平的最有效的保障因素得到了扩展。我们欢迎长久以来缺乏民主体制和进程的国家建立这一体制和进程。

第三点是,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关于多边贸易谈判的乌拉圭回合中,世界面临一次重大的机会,抛弃保护主义,迎接伴随贸易和其他形式的经济一体化而来的经济增长前景。自由和自由贸易相辅相成。

最后,即第四点,里约热内卢的地球首脑会议和《21世纪议程》含有一项全球性的协商一致,也即决心共同采取行动,保护我们的环境。

这些事态发展交织在一起,标志着一个新的分界点;如果我们保持本组织缔造者的信念,我们必须做他们在1945年面临新的分界点时所做的事情,全力以赴,不仅为我们自己,也为我们的子孙后代。

关于安全和缔造和平问题,我要说的第一点是,超级大国之间对抗的消除开辟了集体安全和缔造和平新的可能性,荒谬的是,50年来超级大国对抗的可悲后果在于,我们还不习惯于携手努力;我们就象一个刚刚组建的体育团队,相互之间没有协调可言,可悲地缺乏战略,缺乏团队技术或对新的规则的理解,缺乏共同的决心。我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矫正这些缺陷,但我们必须不断努力加以改善。

另一个矛盾的事情是,和平并没有因为前苏联和美国停止相互之间的争斗一蹴而就。人们看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一些人将事情比作是猛地揭开了加

压器的盖子。内部和邻国之间的冲突似乎一下子爆发出来。这些结果对人类来说是极为可怕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在联合国,缺乏资源,缺乏训练,却面临着巨大的缔造和平、建立和平和维持和平的挑战。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边干边学,我相信我们正是这样做的。

过去一年来,我曾谈到广泛分布在从索马里和克罗地亚的联合国特派团的士兵和救援人员,我对他们在一些极为恶劣的环境下表现的献身精神表示最崇高的敬意。联合国人员正在那里和其他地方努力奋斗,创造条件,以使他们的工作最终不再成为必需。他们实际上正在设法让自己出局。

秘书长题为“和平纲领”的文件目前进入了巩固阶段。问题是清楚的:希望不断增长;机制亟待改革;缺乏资金;缺乏招之即来、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已经提出了一些深思熟虑的建议,包括向会员国派出工作小组,帮助预先确定可用于联合国行动的资源。新西兰愿意对这一方针作出积极响应。

副主席韩先生(大韩民国)主持会议

秘书长还对总部负责维持和平的部门进行了改组。改组维持和平行动司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我们要认识到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资源的调动。对建立和平和缔造和平的新态度应当同以往久经考验、成功的维持和平态度携手并进。

在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安全问题上,近来的维持和平行动突出表明了联合国工作人员在危险和不稳定地区工作的危险性。这不利于招募维持和平者,也不利于募集各国的捐助。联合国必须具备手段,追究那些对联合国及其人员进行攻击或采取其他暴力行动的人的个人责任。

今年早些时候,新西兰政府发起呼吁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证联合国人员的安全。我们曾要求秘书长就现有安排的适当性提出报告。他的报告提出了一些积极建议。他强调指出大会有必要制定一项新的多边文书,确定安理会在为加强人员安全规定适当条件方面的作用。

就在今天下午我非常高兴地参加了安全理事会的会议,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欢迎秘书长的报告并指出安理会今后为保护联合国人员将规定的条件。我还很高兴大会上周同意了新西兰的建议,在今年的议程上加入一个关于人员安全的新项目。我希望第六委员会将建立一个工作小组,审议这个问题并取得迅速进展。我希望这个问题还能在其他一切有关的联合国机构内得到非常充分的讨论。

当然,任何保护维持和平者的机制还必须要求任何冲突的各方尊重那些为了它们的利益而部署在那里的人员的完整。这项任务从原则上讲,应当成为任何维持和平行动任务的组成部分。近来安全理事会在维持和平行动开始部署之际就制定明确任务的作法特别受到欢迎,但东道国仍然有义务既向它的人民仔细说明联合国参与的原因,又要采取积极步骤保证联合国人员的安全。

不过维持和平或缔造和平和建设和平的目的不仅在于解决已经发生的冲突,尽管这项任务是紧迫的。我们必须加强在爆发前防止冲突的能力,而我在此要指出,近来改进解决冲突机制和正在进行的预防性外交的工作的重要性和及时性。我非常热烈地欢迎我的澳大利亚同事、加雷斯·埃文斯参议员对有关这个问题的辩论所作的贡献。他为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论点以及一些有关具体步骤的有益建议,我们可以采取这些具体步骤以改进我们在这一方面的工作。

裁军措施仍然是防止冲突的关键因素。今年,正当国际社会走向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我希望无限期地延长--的时候,大会将把不扩散作为它的重要主题之一。在这方面,对北朝鲜继续回避它在《条约》下的责任需要作出坚决的国际反应。

我们非常热烈地欢迎核武器国家在试验方面表现出的克制以及它们对发起全面禁试条约谈判的积极态度。这并不是走在时代前面。新西兰早在许多年前就已提出了一项关于全面禁止试验的决议草案,它的目标现在已经到了实现的边缘。这个问题需要在裁军谈判会议上提出。鉴于目前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任务的重要性,谈判会议的成员国资格必须对所有那些愿意建设性地参与的国家开放。

在常规武器方面,我们很高兴通过开始登记常规武器转让加强控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化学武器公约,还有一个生物武器公约。

现在审议在常规武器方面能做哪些类似的工作是及时的。随着裁军从空想阶段进入可实现的境地,我们必须在联合国内外尽一切努力保证裁军取得更迅速的进展。任何明智的建议都不应仅仅由于意识形态过时的原因而遭到抛弃。

我认为,民主机构普及全球各个角落是近年来最令人鼓舞的现象之一,其发展迅速惊人。上星期,在仅仅24小时内以色列议会通过了《巴勒斯坦人自治原则宣言》;南非议会通过立法建立了过渡时期执行委员会来管理国家,直至民主选举的政府执政;而在柬埔寨,一个宪制政府已执掌了政权。

我们欢迎这些历史性事件以及它们给那些国家的人民带来的更公正、更繁荣地生存的前景。各国代表团还记得,多年来中东和南非主宰了大会的政治议程。这两个地区的那些积极事态发展将给大会的审议工作

带来新的特色。

我们还可以对大会长期关注的另一条战线上取得的进展感到由衷的满意。联合国现在已进入国际铲除殖民主义十年的第三个年头。好消息是我们已经看到联合国在这一领域的目标和目的几乎已全部实现。现在联合国名单上的自治领土数量已非常少,而其中许多正在寻求创造性的办法完成非殖民化进程。最近联合国于6月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召开的关于殖民主义的研讨会证实了这一趋势。它还表明,在某些情况下,一些非常小的非自治领土并不想要强加于它们的根本的立宪变革。

新西兰一贯强烈主张的原则是,在所有情况下,关于自决的决定当然要有当地人民作出。我们同意某些领土,例如托克劳群岛可能最终会选择发展自治和自由结盟的概念,进一步发展其他非常小的前领土已成功地采取了模式。

在这方面,遵照新西兰对所有非殖民化问题的原则方针,我很高兴地确认新西兰政府和托克劳群岛人民已向联合国发出邀请,于1994年初向托克劳群岛派出新的访问团会晤当地领导人,当然也要讨论目前的事态发展。

民主是各国之间和平的确定无疑的基础。它是对我们全体作出承诺的正式普遍尊重人权的政治表达。今年世界人权大会产生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计划》从某种程度上确定了本组织加强遵守人权可以采取的步骤。

我认为我们应迅速采取行动批准一个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联合国需要一位具有授权的官员,以便在世界各地防止、监督和减轻违反人权行为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人权中心应当有与它正面临的繁重任务相匹配的资源。显然有必要加强咨询服务和技术援助方案,

以协助各国建立其自己的人权基础设施。

人权也包含承认各国人民确立自身特征的权利。值此世界土著居民国际年之际,我对关于联合国宣布土著人民十年的建议表示支持。我们需要在先是在里约热内卢、随后在世界范围的国际年期间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努力。这是一项长期任务。它需要持续和高度协调的努力。

令人不愉快的是,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加强对人权的遵守。我们在二十世纪这最后十年当中似乎有时实际上是在倒退,我们所目睹的违反和剥夺人权的规模是我们原来认为早已不存在了的。由于冲突而变得流离失所的数百万难民的痛苦是我们无法理解的,但却不能也不应该得不到我们的同情。这一侧面在目前安全理事会面前的几乎每一个问题中均十分突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于今年6月份公布的数字为1 900万人——即全球范围内有1 900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数字仍在继续增长。

绪方夫人和她的工作班子在通常是危险和艰难的情况下面临这一问题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其方式值得我们给予特别称赞。新西兰通过对来自波斯尼亚、索马里和柬埔寨的难民拨出专款,并通过对诸如处于危险中的妇女等特别脆弱的群体设立特别项目和提供援助的方式对这些增加了的需求作出反应。我国是目前世界上具有最高人均安置比例的国家之一。当然,这只是治标,而不治本。最终的目标必须是为使难民安全和体面地重返其家园或祖国创造或重新创造条件。

我们不可忽视将那些造成这种痛苦的人绳之以法的必要性。前南斯拉夫战争罪行法庭的建立毫无疑问地成为国际社会对这一特殊冲突作出反应的支柱。充分履行该法庭的授权和使命将有最高的优先。同时,在更广泛的背景下,新西兰还欢迎正在考虑设立

的一个国际刑事法庭。我们希望在大会本届会议期间看到此问题取得进一步进展。

所有国家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对世界的稳定与和平具有关键意义。其中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便是一个公开的、健全的国际贸易体系,一个助长更加密切的经济关系并加强北南交流的体系。发达国家能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最大援助莫过于开放其市场。多边贸易谈判的乌拉圭回合获得圆满结束会给我们所有人带来巨大益处;我相信,在这次辩论期间讲坛上的几乎每一个发言者都提及这一问题。

当然,正象我们所知道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在此方面的进展是缓慢的。许多最后期限已经被超越,而未取得任何结果。我们不应抱有任何幻想。今年12月在乌拉圭回合谈判进行七年之后,不是我们将获得有益于所有人的多边贸易自由化,就是避免全球性经济战争的前景将遭受最为严重的挫折。新西兰政府认为,这些谈判的目的是将当今政治上可达到的目标固定下来,并为明天可能实现的目标继续努力。我们在作出这一准备的同时,还必须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确保所有国家处于能够获得未来的益处的位置所需做的事情上。

我们在关于环境与发展里约会议方面还有许多后续工作要做。但我们时间并不充裕。环境退化继续对地球及其资源造成严重威胁,并且任何国家——不管哪一个——都不会免于这种影响。各国对环境破坏可能负有不同程度的责任,但我们必须一道面对其后果。我们必须实现《21世纪议程》和《里约宣言》的各项目标。所有国家应批准气候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新西兰最近采取了这一步骤。新西兰将向为这两项公约提供资金的全球环境基金作出捐献。我们已经开始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而工作,并正在制定减少温室

气体净排放量的一项全面战略。我们还在逐步淘汰使用损耗臭氧层的化学品方面取得显著的进展。新西兰愿意与其他国家分享其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技术,以协助它们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

我想我们在此能够完成的最为有益的一项工作就是从我谈到的经验和看法中汲取一些教训。对我来讲,最明显的一例是,在涉及人类对和平的渴望、对个人、经济福利和一个良好清洁的环境的尊重所具有的不同特征时,不论其多么重要,我们决不应忽视它们之间的联系。秘书长曾提出和平、发展和民主如何构成一个彼此相互加强的整体;我们同意这种说法。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联系对成功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不亚于其中的每一个单独因素。和平与安全在人民还在遭受饥饿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什么稳固基础的。如果用于取得经济增长的自然资源得不到保护,这种增长也不可能持久。如果重要的选择已经事先为人们作出的话,他们是不可能为经济重建作出所需要的努力的。如果各国不断地提出新的借口——比如环境保护——以为其将外部竞争排除在本国市场之外提供理由,经济增长也是无法持续的。

人类的渴望和人类安全必须全面地加以认识。这是本组织成员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我认为,联合国在维持和平后局势中所做的工作值得重新给予关注。对那些仍有必要促成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国家来说,我们应探讨在联合国与主权政府之间建立一种伙伴关系的可能性。一个由各国政府和一些秘书处之友所组成的协调机构有助于保证维持和平的收获用于重建工作。我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机构框架以使问题逐渐脱离安全领域,从而进入一个更能应付发展与重建需求的论坛。

第二个教训是,我们需要不断地检查联合国在多大程度上适合应付它今天所面临的挑战,并准备在必要时

将其加以改变。联合国的成员数目继续增加,我热烈欢迎最新加入的各会员国。

许多发言者谈到了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安全理事会需要早日改革。我们支持其成员的适当增加以及对整个机构进行一次新的检查。让一些成员——比如说十年为限——代表区域集团的可能性值得考虑。新西兰将继续反对任何扩大否决权的做法。

另一项必须进行的工作是改进安理会的工作方式。与更多的联合国会员国进行更广泛的协商是必不可少的。调整联合国各机构的结构的时机也已经成熟了。大会对其自己作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已经精简了各委员会,但我们还必须精简整个工作量。这个工作量在当前是难以应付的。

到现在为止,我们几年来一直在努力寻求途径,以便通过在别的地方进行相应的节省来为对本组织的新的需求提供资金。对于所有传统作法是否仍然有必要继续下去,我们仍必须提出困难的问题。秘书长的预算提案已经规划了在这个方面的某些重大步骤,我对此表示欢迎。秘书长还指明,更好地进行承包工作是一个进一步节省的来源。

然而,归根结底,如果各会员国缺乏财政承诺,为提高效率和削减费用所可以做的所有事都是徒劳无功的。新西兰准时缴纳其会费;而大多数别的国家并非如此。我促请这些国家也这样做。让我们毫无疑问地继续讨论财政改革,但也让我们在进行这种讨论的同时保证本组织的财政基础。

但是,我们所有人的真正梦想是什么?我将促请所有会员国在满足我在发言一开始所提到的那些基本人类抱负方面保持每年都取得真正的进展,并且在有一个强有力的、有完善能力的和注意力非常集中的联合国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我特别希望看到一个经过改

革的安全理事会、一个注意力更为密切集中的大会、更好的维持和平做法、一个有能力进行建立和平和伙伴关系安排的秘书处、以及以效率和准时性为基础的财政安排。这难道不会给即将于1995年到来的50周年庆祝活动增添意义,难道不会使今后50年内的联合国成为一个比过去50年的情况所允许的更为有效、有生气和激动人心的地方,来处理世界大事吗?这正是这个世界上所有被剥夺权利的人的不折不扣的期望。富人们知道,这个世界太小,不容现在存在于所有人之间的巨大差距继续下去。

多索先生(贝宁)(以法语发言):我谨代表贝宁代表团以及贝宁政府和人民热烈祝贺英萨纳利大使当之无愧地当选大会本届会议主席。他以一致票数当选我们审议工作的领导人,证明了他的能力;这也是他的国家的荣誉,并使人们注意加勒比各国在国际舞台上所发挥的作用。

我借此机会真诚地祝贺他的前任、斯托扬·加内夫先生,他干练地主持了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的工作。

我还非常高兴和荣幸地向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致以他受之无愧的敬意,他有效和成功地领导了这个全球性组织,并正在加紧工作,以便恢复全世界各紧张温床的和平与安全。

贝宁代表团郑重欢迎新的国家加入国际社会,以便为尊重我们全世界人民正在一道努力建设的新社会的共同基本价值观作出它们的贡献。我对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共和国、厄立特里亚、摩纳哥公国和安道尔公国表示欢迎,对它们的接纳提高了本组织的普遍性。

我们象我们每年在相同情况下所做的一样,在这里开会,一道审议促进我们所有国家人民的和平与繁荣的途径和方式。

自大会上一届会议以来,我们目睹了许多重大的事

件,这些事件使整个国际社会在其追求和平的努力中面临着崭新的前景和新的挑战。

当今,国际关系中的民主与平等的普遍价值观已取代了在很长时期内造成政治紧张的两个集团之间的对峙,我们对此表示欢迎。这些价值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所有国家的安全是相互依存。

同样令人鼓舞的是,我们看到对联合国解决冲突的效力恢复了信心,因此加强了本组织采取行动的信誉和能力,开辟了联合国能够在其中促进解决困扰着人类的广泛问题的新的领域。

在仅仅5年中,本组织在维持和平方面的任务已大大增加和扩大。

尽管出现这些积极的事态发展,但目前正在进行的旨在提供更大的自由和鼓励建立更为公正和更有生气的社会的变革不幸地也成为国际关系中新的挑战甚至更大的不确定性的根源。每一天,在我们星球的这个或那个地方,内战、领土分割、种族对立以及部落或宗教斗争都需要联合国的紧迫干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本组织的任务是多么艰巨,它不得不尊重国家主权和干预责任之间的微妙平衡。

在欧洲,政治形势在仅仅几年中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前南斯拉夫爆发的另一场不合时代潮流的战争以及从苏联的解体产生的某些国家中的局势几乎粉碎了柏林墙的消失所产生的希望,从而威胁着这个古老大陆的稳定与安全。

在非洲,重大的内战继续肆虐。这些战争造成了数不清的苦难和破坏,而这些苦难和破坏正妨碍着我们大陆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复苏的努力。

非洲需要和平与安全。没有和平与安全,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进行的无畏而影响深远的改革就无法取得成功。

今年6月在开罗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第二十九届首脑会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通过一种预防、处理和解决冲突的机制的机会。这种机制是朝着接受和平必要性迈开的重要一步,而这对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处理冲突的确仍然是我们各国主要关心的问题,因为这些冲突所引起的大规模的难民迁移令人遗憾地分散了我们对发展这一最重大的任务的注意力。

西非迄今一直是一个和平的避难所之地,欢迎来自非洲大陆其他地区甚至更远地区的难民,但现在它正处于特别困难的时期,紧急局势空前增加,难民的人数也空前增多,在不到四年期间已从20 000人增加到120万人。

在此,我要赞扬联合国为解决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各种冲突而进行的人道主义活动和重大的努力。

由于有了联合国的支持,利比里亚冲突现在有了令人鼓舞的和平持久解决的前景。在利比里亚悲剧中的主要有关各方现在似乎愿意进行对话和达成协议。在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的代表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共同体)执行秘书处的代表以及该共同体代理主席的代表的协助下,他们于1993年7月10日至17日在日内瓦举行了会议,以寻求使战争的枪炮声平静下来和恢复该国和平的方式方法。日内瓦会议的与会方成功地准备了一项考虑到利比里亚悲剧所有方面的全面的协议。

由于贝宁共和国总统、西非共同体代理主席尼塞福尔·索格洛先生的调解,各派的代表和利比里亚临时政府代表于1993年7月25日在科托努签署了该项和平协定。贝宁高兴地看到利比里亚兄弟愿意实施这项协定,并高兴地看到他们建设性的和兄弟般对话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不能产生任何积极的成果。贝宁继续认为对话是使这一饱受战祸的国家恢复和平的唯一途径。

我们欢迎在执行这项协定方面迄今所取得的积极

成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交战各方遵守停火并停止战争行动。

贝宁代表团特别欢迎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第856(1993)号决议,该决议支持西非共同体的努力,并批准在利比里亚部署一支30名军事观察员的先遣队参与联合停战监督委员会的工作。我们还欢迎第866(1993)号决议,该决议设立联合国利比里亚观察团(联利观察团)。

使这一观察团成为可能的唯一办法是动员国际社会支持西非共同体的努力,特别是通过向特别信托基金捐款,以促进非洲国家向联合停战监督委员会派遣增援部队,并协助提供费用用于维持各参与国向联合停战监督委员会派遣的部队,同时国际社会还应协助进行扫雷工作,提供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并促进选举进程的健康进展。签署1993年7月25日和平协定的三方于1993年8月15至18日在科托努举行了会议,以便设立一个过渡性的执行机构国务委员会。7月25日和平协定有希望最终结束利比里亚漫长的破坏性战争。

我要在这个讲台上向签署该项协定的所有各方呼吁,促请他们继续遵守在科托努谈判期间所作出的承诺,并为妥善和迅速地履行这些承诺而与西非共同体以及联合国共同工作,以便结束利比里亚人民的痛苦,并确保民族和解的进程能顺利地完成。

按照正在利比里亚实施的解决办法,我们应努力确保索马里、安哥拉、苏丹和莫桑比克恢复和平。

例如在安哥拉,尽管在葡萄牙埃斯托里尔达成的协议使人们产生了很大的希望和期望,但是安盟拒绝承认1992年9月29日和30日自由选举的结果随后敌对行动重新开始,对此我们感到严重的不安和深切痛心。

贝宁欢迎美国政府改变了它所采取的立场,它现在已在外交上承认了合法的安哥拉政府。克林顿政府

这一行动加强了国际社会的立场：支持投票箱的决定而不支持枪炮的强迫。

南非的事态发展是令人鼓舞的。多方谈判有可能达成一项协议，其内容之一是建立一个过渡性的执行委员会并定于1994年4月27日举行南非历史上第一次民主和无种族歧视的选举。

贝宁政府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纳尔逊·曼德拉先生1993年9月24日在这一有声望的大会堂里向反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发出的无畏而负责任的呼吁，贝宁政府对此表示支持。他请国际社会解除对南非的经济制裁，但武器禁运例外。鉴于将导致这个正处于改革进程的国家执行“一人一票”原则的积极事态发展，我们这个具有普遍性的组织的所有成员支持南非和平转变的时候到了。

贝宁希望看到非洲大陆能摆脱所有自相残杀的内战，摆脱所有妨碍它发展的冲突。我坚定地希望，在非洲战争的逻辑将逐步让位于和平和发展的逻辑。

谈到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26年之后的中东，贝宁不能不高兴地欢迎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所达成的给予加沙和耶利哥自治地位的历史性协定。

这项协定标志着公正持久和平的开始，这种和平将使包括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内的该地区的每个国家生活在国际社会所保证的安全和国际承认的边界之内。因此我们的任务是鼓励两个主要的当事方以及一切有关各方进行或继续进行为实现中东全面和平所必需的对话。

在波斯湾地区，科威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充分恢复有助于重申关于国家间关系的各项基本原则。在这方面，我们衷心希望各国遵守安全理事会关于划分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国际边界的第833(1993)决议。必须解决

诸如科威特战俘问题等各种悬而未决问题，以便为在该地区实现和睦、合作与团结开辟道路。

冷战结束所开创的缓和紧张局势的气氛使得新的协商一致精神特别在安全理事会成为可能，但这种气氛仍很不确定，为巩固和平还要做很多工作。

今天我们必须承认，和平的构想不能再以武器的积累为基础，而必须以削减和彻底消除武器的协调一致努力为基础。恐怖均势现在正让位于统一思想、目标一致、共同行动。

因此，1993年1月13日至15日在巴黎签署《联合国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以及销毁此类武器的公约》不仅有助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且还给在为和平目的利用化学工业领域的国际合作开辟了前景。

贝宁在致力于和平和经济及社会进步同时，敦促国际社会不把科学用于任何军事用途，以便把科学专门用于发展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俄罗斯、美利坚合众国、联合王国和法国决定把其对核试验的暂停延长到1994年9月，这证明这几个核大国政府对可能把科学技术发展专门用于和平目的各项措施越来越感兴趣。

我国要同国际社会其他国家一起，祝贺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改变其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的决定，鉴于该《条约》的力量在于其普遍性，退出该《条约》只会削弱它。

各会员国都已表示决心朝着解决区域冲突的方向迈进，并对地球福利的新威胁有新的紧迫感，这给我们创造了一个解决各国所面临经济问题的历史性机会。

的确，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是在普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召开的。新的经济秩序的特点是三个主要集团——即西欧、北美和太平洋——亚洲地区——之间的贸易有

所增加,在这种新的经济秩序中,非洲几乎被抛在一边。

发达的北方似乎越来越不需要非洲的产品,而非洲也不再拥有购买北方产品和服务的手段。更有甚者,国际社会似乎不急于找出更好的办法,处理非洲国家的债务负担。

这种状况只能导致世界市场上贸易的减缓,并直接影响已经十分困难的非洲经济。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生存就必然要进行持久的区域一体化,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付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并接受如何发展我们非洲大陆的挑战。

秘书长在其“和平纲领”中强调区域组织在建立和平和预防性外交中的作用。这个作用自然也涉及发展。我们对一体化促进发展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就非洲而言,经济一体化是在非洲国家之间促进贸易、投资、研究和发展合作的一种手段。

因此,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共同体)成员国元首和政府首脑1993年7月22日至24日在科托努召开会议,通过并签署了一份经过修订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条约》,并重申决心给区域一体化进程带来新活力。

如果说非洲的发展主要是非洲人自己的责任,那么国际社会也同样必要承认同非洲共同承担责任和充分建立伙伴关系的原则。

我们在这方面应该指出,《1990年代联合国非洲发展新议程》的执行情况辜负了非洲各国对其所寄予的希望。必须进一步加强各国的能力,以创造一种有利于发展的气氛。

贝宁对关于为非洲商品多样化建立一个基金的可行性所进行的研究表示欢迎,但同时我们强烈希望采取更大胆的行动,以期执行新的方案,并确保1994年设立

该基金所必需的主要资金投入。

因此,我们必须提高向非洲提供的援助的质量和数量。

几天以后贝宁将本着这种精神参加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在冷战后时代新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背景下即将召开的这次会议将为国际社会讨论如何重申非洲经济发展问题这个当今世界主要关切问题之一提供一个新的构架。

我们非洲国家普遍希望,这次会议除通过宣言外,将切实导致支持非洲的具体行动承诺。

非洲国家还希望,7个工业化国家集团1993年7月9日的《东京宣言》早日生效——该宣言旨在以另一种更适合发展中国家情况和现实的机制,取代国际货币基金(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方案》。

新的机制如果要有一些成功的希望,就必须在同实际经历《结构调整方案》严重社会后果的各国磋商后再加以制定。

如果我们要赢非洲所期望的发展这一赌注,我们就必须使代表我们国家人口多数的妇女与儿童介入,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教育和训练年轻人和成年人。

在这一方面,贝宁共和国政府正积极地为1994年国际家庭年做准备。我们还将极感兴趣地参加将于1994年9月5日至13日在开罗举行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此外,我们希望为将于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会议筹备工作作出真正的贡献。

将举行这些不同的会议这一事实表明,涉及社会发展的问題正引起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兴趣。这一点也可以从关于在1995年召开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的决定中看出。这种兴趣的再次产生的动力是世界社会和政治局势的深刻变化,以及国家一级各项优先事项的改变。

如果各国人民没有起码的繁荣,民主就不会强大。这种加强民主,从而充分发展人权的一个障碍是贫困,是我们各国人民多数所处的贫困。

发展权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它现在必须被看作是一项优先的权利,一项神圣的权利。这种发展权是尊严的权利,个人发展的权利,它与特别是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围绕着几百万人的低人一等的地位是格格不入的。

发展权是一项人权和民族权,这是为什么我们欢迎1993年6月14日至25日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权会议的结论的原因。这次会议当然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始,我们相信在这一时代目前国际经济秩序将会逐渐消失,因为目前,人类的三分之二无法满足其基本需求,六亿人生活在赤贫之中。消除这种贫困是二十一世纪纲领的基本目标。确立国际消除贫困日(其第一个纪念日将是今年10月17日),就是朝这一方向迈出的一步。

我们必须经常说,我们各国面临的主要生态问题是全球性的,要求全世界共同处理。因此,1992年6月在里约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使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主要关注的事项。

这次会议是我们看待我们未来的方式中的一个转折点。在我们制定发展政策的时候,必须以综合方式对待未来的问题。

《21世纪议程》是这次会议产生的基本文件,这是对20世纪末,21世纪初提出的一项重大的行动方案。它要求各国政府与私营和公共部门密切合作,采取集中注意可持续发展的全国性战略。

我在此高兴地提请大家注意我国极为重视里约各项决议与建议的后续工作。贝宁欢迎建立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93年6月14日至25日在里约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我们并欢迎政府间谈判委员会为制定一

项遭受严重干旱和\或沙漠化的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与沙漠化作斗争的国际公约而开展的工作。该委员会已经于1993年5月24日至6月3日在内罗毕,并于1993年9月13日至24日在日内瓦举行了会议。

根据里约建议,贝宁于1993年8月9日至13日举行了一次全国性讨论会,讨论执行联合国环境会议结论的后续性战略,其中包括审议《21世纪议程》第十二章,其内容是如何与沙漠化及干旱的影响作斗争。讨论会举行的时间正值国际社会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伙伴全力参与考虑使用何种战略实施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这次讨论会证明了贝宁政府履行我们在里约所作的承诺的政治意愿。

科托努讨论会除其它内容外还建议设立一个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全国委员会。现已成立了一个全国《21世纪纲领》起草委员会,讨论会还为该委员会决定了主要的指导方针。它应当于今年底结束其工作。

两年后,我们将庆祝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

1945年以来的岁月的特点是不断的,根本的变化以及联合国组织成员的大幅度增加和联合国开展活动方面的值得注意的扩大。

因此,显然联合国需要改革其结构,以满足当今世界的需要。为此,贝宁支持目前在经济和社会部门及有关领域为改革与振兴联合国所作的努力。

贝宁代表团认为,改革的目的应当是保证联合国各项活动的进一步协调,并且更加合理地利用其人力与财政资源。

贝宁在依然愿意参加各种谈判中的对话的同时,也赞同七十七国集团的意见,特别是关于如何分配诸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和联合国儿童基金等机构的管理机关的席位问题的意见。

在政治方面,我国愿意审议一切考虑到第二个千

年末参与国际政治领域的各大小国家的关注与利益的建议。

安全理事会的改革是对所有会员国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问题。贝宁将密切注意任何可能加强安理会效率,避免使其变成无结果的辩论或者双方僵持的论坛,或成为只有利于少数特权国家的机器的一切建议。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要回顾,如果我们希望平静地进入下一个千年,如果我们希望从迄今为止在走向发展的曲折艰难的道路所作的努力中得到满足,我们就必须尽一切力量更持续地注意世界范围伙伴关系的原则,以及显示出团结精神的责任,这对于现在指导国际社会的新的国际秩序来说是必要的。

贝宁希望,人类在为这一新时代制订第一张决算表时,应当看到继续损害二十世纪的祸害减少,即贫困、饥荒、诸如疟疾的流行病、爱滋流行病及其灾难性的人类、社会和经济后果,失业,环境的破坏,不发达以及所有困扰着我们的其它祸害。

在一个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上并面临着这一挑战,各国必须同意为了我们的普遍的人类价值放弃一部分

只是一部分——国家主权,并且尽管存在着文化、政治、社会和经济差异,表现出更大的共存的决心。只有这样,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才会对人民来说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地方,不管他们生活在哪里和他们是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本次会议一般性辩论中的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

我现在请希望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我提醒各位成员行使答辩权的发言第一次以10分钟为限,第二次以5分钟为限,各代表团应在自己的席位上发言。

安萨里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我谨根据议事规则第73条提及今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代表的发言。

用尽东河的水也洗不掉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外

长给本崇高论坛涂上的错误、偏见和歪曲的污点。他的发言与其说是雄辩不如说是诡辩,这两者加起来相当于起劲地大声叫卖其使用寿命如果不是已经完结也正在完结的产品。

巴基斯坦代表设法装出无辜受害者样子。他想要我们相信他被迫手无寸铁地进行战斗。但是,事实是他不需要武器。相反,他正在利用现代恐怖主义武库中的每一件武器。各国政府、国际新闻界和人权组织非常了解他的政府在招聘、训练、支助和武装恐怖分子,并协助他们渗入印度的旁遮普、查谟和科什米尔各邦中扮演的角色。

最近,亚洲观察的一份报告提出了充分的事实和数据以证实它所称作的这些恐怖分子使用的“巴基斯坦通道”。这一“通道”并不是巴基斯坦如此天真地宣称的道义支持。相反,这是向印度领土运送致命武器的坚固的渠道。美国国务院1991年有关全球恐怖主义的报告和1993年1月8日一位国务院发言人提供了这方面的确凿证据。

情况如此糟糕,致使美国政府非常认真地考虑宣布巴基斯坦为恐怖主义的赞助国。这可以从国务院1993年8月2日给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的信的摘录中看出,其内容如下:

“如果说此后直接或通过私人团体向对印度犯下恐怖主义行为的人提供的官方支持有任何增加的话,国务卿将毫不犹豫地指定巴基斯坦为恐怖主义的赞助国。”

“.....”

“无论如何,国务卿将在不晚于今年12月的时候再次审查这一问题”。

巴基斯坦对促进恐怖主义事业的承诺不仅限于此。它做了更多的事,以确保这一恐怖主义是“可持

续的”。它这样做的办法是在恐怖主义同毒品贸易之间建立了一个牢固的网络。巴基斯坦现任看守政府仅在前几天发表了一份他们一些较为著名的毒品大亨的名单。这份名单读起来就象这一崇高土地的“名人录”。如果需要找到证明巴基斯坦插手的进一步证据,这很容易在埃及、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等国找到,巴基斯坦训练的白沙瓦学校恐怖分子在那里造成了严重破坏。

因此,巴基斯坦外长在大会面前掉下的鳄鱼眼泪实际上为了支持他发出的不同寻常的请求,即世界舆论应当接受巴基斯坦作为世界毒品—恐怖主义主要提倡者的行动。从这一不可接受的前提出发,巴基斯坦政府想要争辩说,它不仅应当被允许任意侵犯普通公民,男女老少的基本人权而不受惩罚,而且也应被宣布为那些违反文明生活所有准则的恐怖分子的人权的保护者。

陪审团对这项奇怪请求的裁决是清楚和明确的。这项裁决写进了今年6月世界人权会议之后通过的《日内瓦宣言》第17段中。这一段的文字是值得回顾的:

“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行为、方式和做法及其在某些国家里同毒品贩运的联系是旨在破坏人权、基本自由与民主、威胁各国领土完整与安全并颠覆合法建立的政府的活动。国际社会应采取必要步骤加强合作,预防和同恐怖主义作斗争。”(A/CONF.157/23)

巴基斯坦外长今天还设法用过时的有关自决问题的陈词滥调来娱乐我们。说他的话是半真半假还算是客气的。但是,实际上,其中包含了针对印度领土完整的罪恶阴谋。他轻易地忽视了联合国早就结束了有关自决概念的辩论这一事实。这一概念本身同在殖民或外国统治或外国占领下的人民有关。它具体禁止将完全或部分肢解或损害各国领土完整或政治统一的行

动。我刚才引证的《维也纳宣言》第2段决定性和清楚地规定了这一点。

查莫和科什米尔邦是印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法律上通过人民意愿加入印度的合法性是不容争辩的。相反,巴基斯坦才是侵略者,直到今天还非法占领着查莫和科什米尔的一部分。因此,剩下来需要解决的唯一问题是巴基斯坦停止这一侵略。

过去46年来,巴基斯坦在三个不同场合下侵略印度是一个历史事实。它每次遭到失败之后都在多边或双边的庄严协定中作出承诺。在这些协定中作出的承诺不久就被忘记了。每一次提出的借口都是渴望获得一些法律上不属于巴基斯坦的东西,其辩解始终同一种含糊不清的原则有关,而它从未在其领土的任何部分对其自己人民实行这条原则。

这位外交部长谈到了国际协定的神圣地位;他存心不提我们两国于1972年签署的《希姆拉协定》,该协定是双边关系的基础。在这一协定中,两国保证不干涉彼此内政、防止敌对宣传,并且还要防止组织、协助或鼓励任何对维持和平与协调关系有害的行动。两国还进一步保证通过双边谈判以和平手段解决分歧。

巴基斯坦政府不执行这些规定,相反,在1984年左右,决定在旁遮普、查谟卡什米尔等边境邦组织大规模的主义活动,对我国发起一场代理人战争。美国众议院研究委员会1993年2月1日发表的一份报告,详细生动地追述了巴基斯坦政府的机构如何参与培训恐怖主义分子使他们渗透到印度。

因此,印度是这些犯罪分子的主要受害者,但并非唯一的受害者。《纽约时报》1993年8月11日刊登的一篇该报驻白沙瓦记者的报道说,美国有关的官员认为:

“涉及2月纽约世界贸易中心被炸案,和6月
纽约第二次爆炸阴谋的一些人以及更多灵感”
(《阿拉伯好战分子受训和等待之处》,纽约时报
1993年8月11日,第A8页)

来自白沙瓦。因此,该问题的全球影响昭然若揭。

因此,记录就是这样,不言自喻。结论是不可避免的,即如此处理同一个邻国的关系与文明行为的准则背道而驰,自我拆台,当然不利于共同福利。

就我们而言,印度祝愿巴基斯坦及其人民一切顺利,我们两国人民由血源、历史和文化纽带联系在一起,而且,必须考虑到一个共同区域紧迫的经济需要。印度人民和政府再一次向巴基斯坦人民和政府伸出友谊之手,希望他们愿意开始一个新的开端,使一位伟大的印度诗人,(巴基斯坦也把他当作本国诗人)穆罕默德·伊克巴尔的远见变成现实。我翻译他的一段对句,

“来,让我们掀起不同的面罩,让疏远的人们
走到一起,

“擦掉陌生的痕迹”

阿克兰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让我来回答我们刚才听到尊敬的印度代表吐出的仇恨之言,他不仅抢走卡什米尔人民的土地,他现在还想抢走巴基斯坦的民族诗人。

查谟和卡什米尔不是印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安全理事会147(1948)号决议注意到印度和巴基斯坦希望“查谟和卡什米尔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的问题应以举行一次自由和不偏不倚的全民表决的民主方式来解决”。(序言部分第4段)举行一次全民表决的要求又在安全理事会的其它决议中得到重申,包括安理会第91(1951)号决议和122(1957)号决议,以及联合国印度和巴基斯坦问题委员会的各项决议,特别是该委员会1948年8月14日和1949年1月5日的决议。印度拒绝执行这些

决议。

作为联合国的正式文件,联合国的地图都标明查谟和卡什米尔为争议领土。卡什米尔被列在安全理事会的议程上,秘书长的最近的报告提及查谟和卡什米尔是必须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解决的一个问题。联合国最早的维持和平行动——联合国驻印度和巴基斯坦军事观察组,从1949年以来一直驻扎在查谟和卡什米尔境内的控制线内。关于卡什米尔是印度的一部分,其实不过如此。

《西姆拉协定》并没有改变卡什米尔的地位。《西姆拉协定》要求通过双边谈判,或双方决定的任何其它方式,最终解决查谟和卡什米尔问题。巴基斯坦一直力图同印度进行双边谈判。1992年,我国总理写信给印度总理。但答复却是拒绝同我们的谈判。印度拒绝在双边谈判中讨论卡什米尔问题。

尊敬的印度代表说,在卡什米尔实现自决将削弱印度的领土完整。但是,领土完整只适用于属于本国的领土,而不是有争议的领土,或地位还没有确定的领土。从1947年以来,卡什米尔一直在印度的殖民占领下。应该把印度当做一个殖民国对待,一个为反对殖民占领,争取自决权利而斗争的人民,有资格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进行斗争。

印度企图抹黑卡什米尔斗争,把它说成是恐怖主义。巴基斯坦谴责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意味着对无辜人民行使毫无理性的暴力。但是,当一个人民遭受外国占领,当他们的家园被入侵,他们的孩子被枪杀,他们的妇女被强暴的时候,难道他们没有权利拿起武器,进行自卫?正如《洛杉矶时报》8月29日引用一名卡什米尔企业家的话说,

“现在,只是一个生存的问题,现在,他们闯入我们的住宅、枪杀我们的孩子……我是一个祖父,

但有时,我觉得我必须拿起枪。”

如果说卡什米尔人是恐怖主义分子,那么所有那些用他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为反对殖民主义而斗争,并为今晚在这一大会堂中所代表的绝大多数国家赢得自由的那些英勇儿女们,全都是恐怖主义分子了。如果说卡什米尔人是恐怖主义分子,那么,在此代表的大多数国家就是恐怖主义的产物。

最近在维也纳举行的人权会议,特别注意到在殖民地和其它形式的外国统治和外国占领下的人民的特别情况,并承认他们有权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任何正当行动,以实现他们神圣的自决权利。印度在卡什米尔的行动构成国家恐怖主义。雅加达不结盟首脑会议称镇压人民争取自决的斗争为最严重的恐怖主义形式,这对卡什米尔的人来说是酷刑折磨。我援引国际律师促进人权联合会的一份报告说:

“人民,主要是青年男子,每天在卡什米尔遭受酷刑折磨。当地的人权工作人员、律师和医生搜集了应有尽有的证据,支持这一指责。…所采用的手段是野蛮的、非人道的,和难以想象的凶残。被拘留者被棍棒和铁皮竹棍毒打,被软性电线鞭打;他们遭受电击治疗…”。

我不能再说下去;这太野蛮,不能再这一讲台上重复。

大赦国际说:“酷刑在查谟和卡什米尔有系统的实行。”

强暴:今天下午我们提及卡纳帕拉(Kanan Poshpera)。1992年10月10日,印度军队在帕克沙依德帕拉村(Chak Saidpara)又犯下了一次集体强奸罪。亚洲观察的一份报告说,随着卡什米尔冲突进入第四年,中央和邦政府在制止印度治安部队普遍的强奸行为方面无所作为。自从1990年以来,放火已成为印度反叛乱战略中的一项武器。

屠杀:索帕拉(Sopura),1993年1月6日。巴特科特(Batekote),1992年10月1日。纳斯罗拉哈帕拉

(Nasrullahpora)1992年7月13日。这种例子数不胜数。

印度代表故意以不应当用于邻国的语言来谈论巴基斯坦。让我提醒他,我们巴基斯坦具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巴基斯坦没有一个地方象克什米尔那样处于紧急管制之下。跟印度不同,我们在巴基斯坦没有集体迫害。自从1947年以来,已经有十万名穆斯林在宗教疯狂及社区暴力的事件中丧身。我们巴基斯坦不仅讲民主,我们也实行民主。我们不象印度想获得十全十美。但我们肯定比印度要好,印度已经迅速地成为亚洲的病夫,为内争所困,全国分裂为各种种性、阶级与民族,充满了印度原教旨主义的不理智和害人的力量、其政府的政策是犹豫不决和模棱两可的,它动辄就欺负邻国,总是倾向于使用武力;这一国家自独立以来已经进行了17次不同的战争、这是本会议厅里有代表的任何国家中战祸最多的国家。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提醒各成员,第二次行使答辩权所作的发言的时限为五分钟。

我现在请印度代表发言。

安沙利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我们不得不第二次发言。

巴勒斯坦代表为这次大会既没有提供任何消息也没有任何提供见解。他的发言使人想到诗人Iqbal的另一首两行诗,随便说一下,Iqbal从出身到去世都是印度人:“他不干正经事,却热衷于盲目的效仿。”我国代表团认为这种描述实在是最恰到好处的了。

下午9时30分散会。